

林文庆及其儒家思想研究
A Study of Lim Boon Keng and His Thoughts
of Confucianism

陈慧娴
TAN HUI SEAN

MASTER OF ARTS (CHINESE STUDIES)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SEPTEMBER 2013

林文庆及其儒家思想研究
**A Study of Lim Boon Keng and His Thoughts
of Confucianism**

By

陈慧娴

TAN HUI SEAN

本论文乃获取文学硕士学位（中文系）的部分条件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Chinese Studies)
September 2013**

摘要

本论文主要探讨一位生长于峇峇家庭，自小接受英式教育，然而，他最终选择回归东方汲取养分，以儒家思想作为他社会改革的核心思想的南洋清末历史人物林文庆（1869-1957）。林文庆是一位留学英国的医生，属于新加坡高知识分子或能言善道的社会精英。年轻时林文庆曾远赴爱丁堡大学升学，亲睹了西方之繁华，但他却劝导人们不要一味的崇拜西方国家，而忽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他尤其重视儒家思想中的教化功能。

林文庆一生的特殊性在于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并综合现代思想，而在南洋改造海峡华人社会的道德观和内涵及在中国华人社会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的价值观。他曾游走在南洋与中国间，先后在华族色彩日趋褪色的海峡华人社群众播下儒学的种子；于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中的厦门大学默默栽种儒学的幼苗。

在论文前言部分，我们交待了论文所探讨的问题，亦略谈十九世纪末儒家思想在南洋的发展。

在第一章里，我们分析了林文庆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生平际遇。笔者尝试通过其所处的时代，探索他和时代的互动、时代对他的海峡华人属性与身份认同所产生的冲击与影响，以此进一步窥探其由西学回归中学，坚守宣扬儒家思想之缘由。

论文的第二章，我们论述了林文庆为社会、国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与卓越的贡献。他是十九世纪末在南洋深受瞩目的社会精英。他的专业是医学，但他所展露

的锋芒却不局限于医学界，而将触角伸展到其他领域，如教育界、商界、社会改革运动等，展现了其多面性的才能。

长期以来，专家、学者们对于林文庆所提倡的儒教或孔教是否属于一种宗教，皆持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因此，在第三章里，笔者则尝试综合前两章所谈的时代背景及生平事迹，论述了林文庆如何定义孔教及在南洋与中国倡导孔教的历程。由于林文庆的儒家思想面向众多，因此，笔者主要分析其有关“孔教”、“教育”及“女学”三方面的理念，并侧重论述林文庆“培育君子”的儒家思想。

结语处，笔者总结林文庆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交圈子对林文庆的思想及文化认同所产生的影响。透过他毕生的所言、所行、所著，尝试勾勒出其儒家思想的内在本质及其儒家思想所蕴藏的意涵，使林文庆立志习儒的面貌和意义得以重现。

本论文最主要的贡献是论证了林文庆选择以中华文化为其“文化认同”，确认了“儒家思想”为其人生导向。除此之外，笔者探讨与梳理了林文庆所遗下《民国必要孔教大纲》里所展现的儒家思想。透过《民国必要孔教大纲》这一本著述，我们更加清楚地探讨林文庆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儒家思想的认识。儒家学说博大精深，然而，碍于笔者学识浅薄，因此未能全面、系统地分析林文庆之儒家思想。是以寄望未来能有学者更全面研究此课题。

关键词：林文庆 儒家思想 孔教 教育 女学

Abstract

Lim Boon Keng was an outstanding Chinese Singaporean community leader in the 19th century . He was one of the earliest examples of Singapore's intellectual-elites.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examine this historical figur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his sense of identity and his thoughts of Confucianism.

Besides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the thesis is structured into three chapters. The introduction explains the motive, objective and condition of the study. Chapter one will be focusing on how the personality of Lim was shaped by observing his family background and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he lived.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of China, Britain and Nanyang in the 19th century had great influence on Lim.

The second chapter will focus on the thoughts and deeds of Lim. Beyond establishing himself as a reputable medical doctor, Lim became very active in public affairs who promoted social and educational reforms in Singapore and China. This chapter will be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including his contributions in the fields of medical, business, politic and education. During his long and eventful life, Lim was a medical doctor, legislator, scholar, educator, entrepreneur, community leader, social reformer and philanthropist. He began the first Chinese rubber enterprise in partnership with his friend. He founded the Philomatic Society and the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 He published *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He also campaigned against the opium and the wearing of queues among Chinese men. Besides, he co-founded the Oversea-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 the 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and served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Amoy. His devotion and 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s were undeniable.

To Lim Boon Keng, was Confucianism a religion? Many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this question. Thus, the third chapter will outline the manifestation of his thoughts of Confucianism. In this chapter, the focus is expanded to analyse the thoughts of Confucianism of Lim. Lim looked to Confucianism as a source of national pride for the all Chinese, including the Chinese community living under British colonial rule in Singapore. Lim .

In Conclus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s of Lim. In responding to the religion,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The main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the sense of identity of Lim Boon Keng and his thoughts of Confucianism through his literary work, *Indispensable Confucianism Leading Principles For The Republic*. (《民国必要孔教大纲》)

Keywords: Lim Boon Keng, Confucianism, Education, Female Education

谢词

如今，回顾做论文的点点滴滴，我可以总结说：“做林文庆这位人物是一件很快乐的事，而写论文原来可以那么享受。”

首先，我真挚地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黄文斌副教授，让我与林文庆“相遇”。没有善知识的循循善诱，没有乐学读书会带来的脑力激荡，就没有《林文庆及其儒家思想研究》这本论文的产生。在成长的路上，迷茫、受挫之际，谢谢理性中带感性的黄老师给予我前进的信心、毅力。黄老师不仅鼓励我到国外交流及参加学术研讨会，还启发我思考生命的价值，并引导我重回佛陀的怀抱。蒙其不吝赐教及大力鞭策，学生受益良多。我也不得不提温婉的黄师母有着一颗细腻的心，一双“green fingers”，一双能变出可“鼓舞士气”的面包、酥饼与蛋糕的巧手，让我们这群学生吃在嘴里，暖在心里。

再者，感谢老师们对我的提携与启迪：像是林水榭师的身教言教，郑文泉师引领我走入林文庆的世界，陈明彪师的用心指导及其对学术严谨的态度让我获益良多。此外，我亦很感激张晓威师给予我在厦门大学讲述林文庆的珍贵经验，劳悦强师的细心提点、关怀与鞭策，杨儒宾师的博学幽默，以及其他老师的循循善诱，这都让我在学习的旅程里获益匪浅。而能得到众多学术前辈的指导，更是后学的荣幸。一趟闽南之旅，让我在阔别多年之后，再度感受久违的“中文系之家”的感觉。中文系师生间的情谊、手足间的互助互爱，那一股凝聚力是如此的让人悸动。此外，忘不了好姐妹凌香、慧倩、露仪学姐、丽华姐、汉伦学长、永信学长、树枝老师、世俊学长、丽丽、佳佳、修纯、小惠、惠盈、心慈、润远、涌和、晶木、静

怡、颖杰等同学在这段时间为我加油打气，为我注入正面的能量。

家人的全力支持及窝心鼓励，是我充满活力与动力的泉源。最后，感恩亲爱的爹地、妈咪、姐姐、妹妹、川给我那么幸福温暖的家。在此，我亦谢谢丹绒士拔领养家庭多年来的呵护及照料。

谨此特向所有曾给予后学协助的人表示衷心感谢。因后学见识浅短，纰缪疏漏之处颇多，尚请大方之家不吝指正。

论文核实书

本论文林文庆及其儒家思想研究为陈慧娴亲自撰写，是为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硕士学位取得之学位论文要件。

此证

(黄文斌副教授)
指导老师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副院长

日期：_____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日期：08.02.2013

硕士学位论文提交

此证陈慧娴（学号：09 UJM 02337）在中华研究院中文系黄文斌副教授兼副院长指导之下，经已完成此一题为林文庆及其儒家思想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

本人亦了解拉曼大学将以 pdf 格式上载本硕士学位论文至拉曼大学资料库，供作拉曼大学教职员生及社会人士查阅使用。

此致

（陈慧娴）

论文声明

本人谨此声明：除已注明出处之引文外，本论文其余一切部分均为本人原创之作，且未曾在此前或同一时间提交拉曼大学或其他院校作为其他学位论文之用。

姓名：陈慧娴

日期：08.02.2013

目录

摘要		ii
Abstract		iv
谢词		vi
论文核实书		viii
论文提交书		ix
论文声明		x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	5
	第二节 前人研究成果	9
	第三节 研究方法	13
	第四节 章节简介	14
第二章	林文庆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生平际遇	16
	第一节 清朝末年时代的中国、英国与南洋（1840-1868）	18
	第二节 林文庆的幼年时期（1869-1878）	23
	第三节 探寻人生方向的求学时期（1879-1895）	28
	第四节 型塑林文庆人格特质的成熟时期（1896-1937）	32
	第五节 迈入古稀之年、重返南洋时期（1938-1957）	36

第三章	林文庆及其多元才性的展现	38
	第一节 悬壶济世的医生	38
	第二节 长袖善舞的商人	44
	第三节 涉足政界、为国为民的领	48
	第四节 诲人不倦的一代导师	55
第四章	林文庆的儒家思想研究	61
	第一节 孔教的诠释与信仰	65
	第二节 培育君子的教育理念	75
	第三节 倡导儒之贤女	91
第五章	结语	103
征引书目		108

第一章 绪论

南洋华人社会原本是个移民社会。南来的先辈虽多为目不识丁的草根群众，但身上携带的文化基因，使得他们移居南洋后，依旧保持了儒家的许多行为规范。因此，我们可说先辈们挟带着儒家文化传统前来南洋。本论文研究的主角林文庆（1869-1957）虽是一位受西方教育的医生，但最后却拥抱中华文化，并以儒家思想为他一生的价值观，而且积极地社会推动儒家思想。从林文庆的个案，在在显示南洋移民先辈具备中华文化及儒家思想的基因，只要获得启发及通过学习，就可以开展出精致的思想文化。

自清朝在新加坡设置领事馆以后，在历任领事如左秉隆（1850-1924）和黄遵宪（1848-1905）的努力之下，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承开始出现了新的局面。1899年出现的孔教复兴运动，大概是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人文化民族主义的最重要的表达。虽然运动包含着文化、宗教、政治和社会成份的混合物，但文化成份大概是最重要的（颜清湟，2007：105）。这一运动，受到新加坡三家华文报纸，即《星报》、《天南新报》和《日新报》的支持。它们广泛报导各种运动，发表社论和文章，制造一个有利的舆论气氛，使运动发展（颜清湟，2010：4）。本论文的主角林文庆不仅是《日新报》的创办人，更在好友邱菽园（1874-1941）所创办的《天南新报》担任英文总校一职。两人相识于1895年，在领导孔教复兴运动上是并肩作战的伙伴。林文庆是海峡华人社群当中的佼佼者，而邱菽园则是家财万贯的

中国举人。两人因志趣相投而联手合作，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南洋孔教复兴运动。各种文社、学校、报社在当时纷纷涌现，为儒家文化的大规模传播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此运动也得到一些前来访问的儒家学者官员的援助。当时中国的儒家学者如邱逢甲（1864-1912）、王晓沧（生卒年不详）和吴相桐（生卒年不详）等人也南来协助这个儒学运动（陈徽治，2003：267）。虽然他们以官方身份来到新加坡和马来亚促进商业，但他们也发表公开讲演和投稿宣传，支援运动。

和中国本土最大不同的是，新马响应孔教活动者以地方绅商为主，而非士大夫。由于商人的推动及在经济上的支援，孔教活动中最重要的孔子诞辰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各埠华人的公共假期，当时的报纸就载道：“圣诞停工。明日为先师孔子圣诞良辰，凡我华人虽居海外，究属孔教中人，明宜悬灯结彩同申庆贺”（《天南新报》，1901年10月8日：1），可见孔诞之受到人们的大肆庆祝。

1902年，一个有195名委员的委员会建立了起来，发出了向全体华人呼吁的通告，并也发布了设立孔庙和现代学校的规章。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筹款建立孔庙和学校。除了现场捐献外，委员会还组织其委员到住家劝募，但最有效的方法是对捐献大户给予名誉。规章规定，较慷慨的捐献者的神主牌，将放置在孔庙内或孔庙旁的神龛上。这一运动深入的结果，在1902年中，就筹集了20多万元叻币（颜清湟，2001：106-107）。

然而，后来，南洋孔教运动的规模逐渐萎缩，在这之中包含了许多因素，如：埠中领导者的更迭、大环境的变迁、来自中国新思潮的影响、有规模的学校纷纷设立等，直接或间接的导致藉由孔教之名而设学的动机不复再。新马孔教的尝试基层化和民间化趋向，表现了华人宗教对于社会的一种适应过程。在社会领袖林文庆与邱菽园等人的带领下，南洋华人在殖民地时代，由于中国的影响，加上民族自觉运动及配合当地社会的需要，衍生出富有当地特色的孔教运动。

本论文的主角林文庆出生在峇峇家庭，是一位集医生、教育家、商人、议员、社会改革家等身份于一身的社会精英。其成长的背景和早年所受的教育的确是偏向西式教育，但却并没有造成他往后不能逾越的鸿沟与界线。林文庆在中西文化之间游离，虽然曾面对峇峇、英国殖民地子民及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困扰，但他最终以“中华文化认同”或“儒家思想认同”为其抉择，而不局限在身份、地域的现代政治概念的认同上。

林文庆从西学回到中学，在南洋与中国厦门两地宣扬孔教是有其特殊性的。他对儒家思想日渐有了更深入的体认，并全心投入到《民国必要孔教大纲》的撰写中。林文庆视孔子为中国历史第一伟人。林文庆认为，孔子对中国历史文化最大的贡献不在政治与著述，而是在“为学”及“教育”上。孔子集前古学术思想之大成，开创儒学，使之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干。在〈孔子序略〉（林文庆，1914：8-18）里，林文庆写孔子，重在结合孔子的思想与人生行事，期望真实而全面的彰显他在中国历史文化上的重要地位和巨大贡献。

即使有着多重的身份，这位杰出的海峡华人最重视的还是教育，这和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巨大关系。他个人在教育上所作的努力，使南洋和中国的华人都获益匪浅。多年来，他鼓吹教育、倡办女子学校、力兴孔庙学堂、协助创办“爱德华七世医学院”等，其成就是有目共睹的。1921年，陈嘉庚邀请他到厦门大学出任校长。林文庆依然答应，往后十六年，他谨守岗位，使厦大成为南中国一间著名的大专学府，培养了一批批的人才。然而，不论他身在何处，儒家思想中的“德育”是他最为注重的部分。

目前，研究林文庆的学者，一般都注重林文庆对南洋社会、经济、教育、社会改革等诸方面的贡献。但似乎忽略了他对中国思想史，尤其是他对儒家思想的贡献。若我们未能掌握林文庆的儒家思想，或没有发掘他在这方面的核心思想，那就意味着我们无法更好的解读他的思想与行为及其为社会所做的一切，换言之，我们将无法全面的了解林文庆这号人物。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笔者的外公与外婆是峇峇与娘惹，口操流利的英文与福建话，不谙华文，却坚持让十五名儿女必须学习华文及接受华文教育。身上窜流着峇峇与娘惹血液的笔者，遂选择了同为峇峇的林文庆为研究对象。出生峇峇家庭的他，自小受英文教育，年轻时曾远赴爱丁堡大学升学，并以优越的成绩考取医生学位。当时身在西方社会的他，亲眼目睹英国的繁华而惊叹不已。但，他却热切的向汉文化认同，正如他在〈我们的敌人〉这篇演辞当中向群众铿锵有力的抛出了十项关于海峡华人拒学中华文化的质问，其中包括了：一、是谁阻挡了华人前进的路？二、是谁使他们远离了让欧洲各国由无知跃升为文明国的哲学与科学？三、是谁使他们丢弃了科学精确地发现？四、是谁应该为华人青少年只接受良好的欧式教育而厌恶华人形式主义与华人宗教而负上责任？五、是谁导致了海峡华人强烈地漠视中国经典、语言及文学？六、是谁该为华人青年改变信仰去信奉基督教（Christianity）、伊斯兰教（Islam）及神智学（Theosophy）而受到责难？七、谁是阻碍所有华人想要获取成功的真正肇事者？八、谁是散播那些不利华人评论的真正煽动者？九、是谁让日本能攻击及摧毁中国？十、是谁应该为海外华人尊严大受打击而承担责任？（Lim, B.K.,1897:53）。这篇演讲为海峡华人认识儒家思想起了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回国后的林文庆积极推广儒学，提倡儒家的先哲之治。笔者认为，林文庆本身的英文教育背景，相较于儒家，两者之间的交集格外有意义。因为其特殊的背景，故林

文庆当时在新加坡全面推广儒学时，能用英文传播儒学，向不同教育背景的南洋华人社群灌输儒家思想，这是他的重要贡献之一。

本论文的主角林文庆出生于 1869 年。1840 年鸦片战争后至 1911 年间时期，中国因各种战乱及天灾等，造成大量的华工移民南洋谋生，此时期的华人与旧时期移民的海峡华人结合而形成独特的华人社会。这段时期，正好是林文庆前一代人的事情，由此可以探讨他出生以前中国所发生的问题及造成的影响。当时南来的先辈大部分是草根阶级的，因而在南洋形成了属于劳动群体的移民社会。林文庆是当时第二代在南洋土生土长的海峡华人，自小就接受正统的英文教育。他人虽远离中国，但这位热衷于儒学的峇峇却与同时代的社会领袖合作，推动了南洋史上首个儒学运动。在此，笔者要特别突出的是清朝末年南洋的儒家思想与中国的儒家思想是大为不同的。纵使林文庆所倡导的儒学运动是和维新运动有关系，但他关心文化及推行儒家思想的努力，却与康有为“保皇”、“保教”的出发点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从林文庆的著作当中，可窥探他对儒教运动的推动，不仅仅是宗教的层面，同时也涵盖了维护华人教育与文化的意义。

由此可见，南洋受到中国和英国的政治及文化环境的影响，所以南洋当时的社会形态、社会阶层与中国是不一样的。本论文的主角正是在此背景成长，林文庆从西学回到中学，希望以儒家学说改造海峡华人社会的道德观和内涵，这种信念直至他身在厦门亦没有动摇。因此，他在南洋及厦门大学倡导孔教运动是有其特殊

性的，和康有为在中国含有政治目的的维新运动是不尽相同的。这些课题都在本论文中有更深入的探讨。

十九世纪末儒教复兴的运动，是一项相应中国维新运动，同时又富有地方自发性的文化活动，而且活动范围还从新加坡扩展到马来亚和印尼，缔造了世纪之交南洋儒教复兴的文化运动（李元瑾，2001：172）。当然，参与这项儒教复兴运动的南洋闻人众多，但正如陈荣照〈儒学在新加坡的传承与发展〉一文中提到的：在这场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新加坡的著名诗人邱菽园和社会领袖林文庆始终是这个运动的倡导者。在1897至1907年之间，这两位学者号召同志，集会结社，捐资献地，并且周游演说，同时又通过中、英文的报章和杂志，积极宣扬儒学，影响及于邻近各埠，使崇儒尊孔之风，遍及南洋（陈荣照，2003：61）。他们不断地建立起教授四书、五经的学校，创办了许多具有儒家精神的华文报刊，设立了不少宣扬儒家传统美德的文化团体、宗乡会馆、义务医院等机构（苏新鋈，2010：139）。当时中国的儒家学者如邱逢甲、王晓沧和吴相桐等人也南来协助这项儒教复兴运动。

本论文之所以对林文庆进行研究，是基于下列四个重要的原因和条件：

第一、林文庆是横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的人物，经历过西方、中国及南洋所带来的文化冲击、动荡的政治局势与民族危机。

第二、他是当时活跃的社会领袖，并有着多重的身份，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举足轻重。

第三、他与同时代的多位社会领袖因理念相近而携手合作，但其思想、价值观及处事方式却与他们有分歧。

第四、他有丰富及精彩的著作传世，不仅能供后人参阅，亦是极具历史、社会、哲学或文学研究价值。

林文庆一生的作品当中，至少有十六篇在题目上有着“儒家思想”字眼，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他于 1914 年撰写的《民国必要孔教大纲》，更全面、清晰的向世人展现其对孔教的诠释与信仰。另一方面，他以出色的文学造诣翻译屈原的〈离骚〉而声名远播，更是使中国文化在南洋灿烂绽放的儒学运动领袖。纵使生命中有高低起伏的际遇，林文庆身上携带着的中华文化的基因，促使他学习及实践儒学。

因此，笔者将根据林文庆一生的思想行为，从他的成长过程、当时的政治局、留学背景、教育及著作的部分，剖析他对种族、文化、宗教的认同，从中探寻其儒家思想的实践，并经由此肯定林文庆推动儒家思想所带来的历史意义和当代意义。

第二节 前人研究成果

关于林文庆的研究已有些成果，但更多的是叙述他的生平与社会活动。至于深入探讨林文庆的儒家思想研究仍然是个值得开拓的课题。关于林文庆在当时南洋的社会活动确实有相当多的资料，然而专注于探讨林文庆对儒学之实践的研究却不多。就目前笔者从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马来亚大学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台湾的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等所收集到的有限资料，大致有以下相关资料。现在分析如下：

（一）李元瑾的《林文庆的思想：中西文化的汇流与矛盾》（李元瑾，1991）透过林文庆的成长背景、时代环境及生平事迹，整理出林文庆曾挣扎于中西文化的冲击与矛盾，之后转而热衷于儒学研究的原因及他本身很坚定的一套儒家学说。作者以不同的章节分析林文庆对儒学的推崇、对儒学的理解、对儒学的推行。此外，作者也大篇幅的以林文庆的专书及文章论证其儒家思想。最后再强调林文庆虽是当时顶尖的知识分子，却深具对于民族的忧患意识，因而真诚的学习儒家思想、发扬儒教，配合中国维新运动在南洋的光辉时期，而不是以政治目的为主要考量，致力倡导儒学。然而，笔者在翻阅及研究林文庆的多篇文章、演讲辞及著作后，发现林文庆数次提到西方的价值观不一定和儒家的价值观相冲突或存在着矛盾，两者是可相通的。关于这一点，笔者在论文中将有进一步的分析与论证。

(二) 严春宝：《大学校长林文庆——一生真伪有谁知》（严春宝，2010）这本书叙述了林文庆的一生，对于林文庆在南洋、英国与中国的大小事宜皆有着墨。有别于其他专书的含糊交待，此书对于林文庆与鲁迅之间的矛盾有着详尽的分析与论述，更完整的交待了两人之间的冲突。作者认为林文庆拥有东西方文化的背景，因而有着融合东西方文化的视野。书中仅有第十六章提及了林文庆是理性的儒家学者，并引用了林文庆的作品当中的论点，论证林文庆并非是守旧及迷信的。作者最后提到了林文庆是“一个穷其一生追随儒家思想和理念的思想家”及“一个终生游走在边缘的人”，肯定了他向西方宣传和儒家思想的举动。但书中却没有提及林文庆高度重视儒家思想的原因，亦没有进一步论述其宣扬儒家思想的时代意义。关于这两点，笔者在论文中将做出进一步的分析与论证。

(三) 李元瑾的《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李元瑾，2001）这本书将三人并列研究，对照十九世纪英国、中国和南洋的时代背景和政局，有系统地记述三人的成长、家庭、教育及人生重要事迹，对三人的人物类型进行分析和比较，并提供许多例证，以探讨这三位知识分子对东西文化的撞击所作出的不同反应。此书是笔者参照资料的重要来源之一。虽然此书并非专门论述林文庆在儒学运动上的缘起、过程、思想、影响和成果，但细细阅读，不难发现儒家思想对其一生的影响至深，由此可见关于林文庆的儒学思想仍具有研究价值。唯，作者对林文庆与另两人作了各方面的比较与分析，

仅有小部分提及他们儒家思想的异同。因此，笔者将深入探讨与分析林文庆的儒家思想及其所产生的影响，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四）Khor Eng Hee 的 *The Public Life of Dr.Lim Boon Keng*（Khor Eng Hee, 1958）极有条理的论述了林文庆在医学界和商界的活动。作为最早期研究林文庆这位历史人物的硕士生，作者记载了林文庆返回新加坡后在直落亚逸街行医，和朋友合资创设西药房（The Dispensary）的情况。1896 年，林文庆与市政府举办首次全市健康调查，并于 1904 年领导华人，向总督呈请创办英王爱德华医学院（The King Edward Medical School）。此外，作者描述了林文庆在橡胶公司、锡业公司、华侨银行、保险公司等的商业成就。此论文从医学及商业领域上，扼要的呈现了这位新马历史的重要先驱人物，成为日后学者们参考资料的来源之一。美中不足的是，作者并没有在掌握林文庆的生平事迹后，对其思想与行为作进一步的探讨。

（五）李元瑾的〈林文庆：中华文化复兴者与现代教育家〉（李元瑾，2003）浅谈林文庆的生平，着重论述林文庆复兴中华文化的文教事业，并以林文庆为厦门大学作出牺牲与贡献一直不获重视，但在作者多番努力下，最终获得学者、教授们的热烈回响，使林文庆终于受到了肯定及认同作为文章的结束。由于文章并论及林文庆在文化回归、文化复兴、文化传播和中国、新马教育上的多重角色及努力，因此深入探讨林文庆的孔教思想与学术研究则略为不足。

（六）颜清煌的〈1899-1911 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孔教复兴运动〉（颜清煌，2010）的第一段正是以简介林文庆受过西方教育，却深受儒学影响及启发之背景为文章的开端。作者先论述中国的孔教复兴运动，再延续性的分析孔教在新加坡和马来西得以复兴的种种原因。更重要的是，作者的其中一个章节从教育背景、婚姻关系及社交圈子的角度，论述林文庆坚定复兴儒教的因素，以及作为领导人的林文庆作出关于教育、改革当地华人社会中各种旧的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的努力。此文章对早期孔教运动的复兴有较明确的论述，对笔者的研究课题有着学术性的参考价值。

从以上的研究资料显示，大部分研究成果把焦点集中在林文庆的生平及思想的研究上。除了以上的研究资料，另有一些英文的单篇文章叙述林文庆的生平，多为一般的人物介绍，非学术性质的研究，因此没有引用。本轮文所强调的，是从儒家思想的视角，梳理林文庆当时在南洋与中国社会所作出之改革与贡献，进一步论证及分析他的儒家思想，尤其在“孔教”、“教育”和“女学”三个方面的儒家思想。本论文将论述与凸显林文庆对儒学之实践，突破长期以来缺乏研究者深入探讨其儒家思想的范畴。由此肯定林文庆在当时中国“反传统”、“打倒孔家店”的时局下，仍然全力维护及宣扬儒学的独特见解和坚持。

第三节 研究方法

颜清湟教授在为李元瑾博士的《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写序时表示：“近年来，海外华人的经济和商业成为学者们竞相研究的热点。但有关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的研究，却凤毛麟角。”（颜清湟，2001：ix）。而针对林文庆儒家思想的研究，除了李元瑾博士的作品和以上一些单篇论文中小部分的叙述外，几乎未见。然而，这位十九世纪末儒学的倡导者——林文庆，他却自称自1894年开始为儒学奔走演讲，就已发表多篇关于儒家思想的文章与演辞。因此这些相关的专书、文章和演讲辞被视为最基本和重要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都是本论文所依据的重要材料。

换言之，为了要更明确的掌握和研究林文庆的儒家思想，必须通过其生平事迹，当时的政治背景，所发表过的作品和演辞等加以考证及研究。因此，以下两类第一手资料是本论文必须参考的：

第一、林文庆本身的作品和演辞，即其丰富的中英文专书、论文、单篇文章和演辞等。

第二、杂志与报章，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林文庆创办、主笔或经常投稿的刊物，一种是当时报章报道或刊登有关林文庆的诸种消息、文章和演辞的一些重要杂志和报纸。

第四节 章节介绍

在绪论之后，笔者将在第二章叙述林文庆的生平，其中包括他的成长背景、受教育的经过、两段婚姻、厦大风波及他在日治时期的经历。此外，论文的第三章则详细论述林文庆在医学界、商界、政界及教育界为社会、国家所做出的努力与贡献，刻画出其驰骋于不同领域中所展现出的多面性。

儒家学说有着许多面向，林文庆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在南洋与厦门大学大力推行孔教运动及女学运动。此外，培育德智兼备的君子是他办教育的宗旨，目的则是兼善天下。不管他身处南洋或中国，办教育是他认为责无旁贷的使命。因此，论文的第四章则主要将从林文庆所遗下的丰富的中英文著作、单篇文章、演辞，尤其是他所撰写的《民国必要孔教大纲》，进一步分析与论证林文庆对于“孔教”、“教育”及“女学”三个方面的儒家思想。纵观林文庆一生所思所为，他坚信教育是为国为天下培育君子的重要途径。因此，此章亦侧重论述林文庆的“培育君子”的理念，以及强调“德育”的儒家思想。

结语的部分提到纵使林文庆的专业是在医学，但他不局限自己在医学界，而是进一步突破自身的局限，将触角伸展到其他领域，向社会大众展现其多方面的才

能。纵观他的著作、生活型态与人生历练，儒学确实成为他极为注重的生命涵养，进而时时鞭策自己学习及展现“君子”的风范。

第二章 林文庆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生平际遇

在东南亚新兴的国家中，“身份认同”（Identity）常困扰着许多华裔的东南亚公民。作为东南亚新兴国家的少数族群，他们的身份认同常被当地政府和土族人士怀疑、歪曲。甚至被利用为政治武器来攻击他们。“身份认同”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心理学和社会名词，强调主观意识对事物的自我定位。它有许多不同的种类，包括种族、地域、文化、政治、经济、国家、阶级和社会地位的认同等。“身份认同”有很强的包容性，可以容纳许多不同的种类。一个人可以属于某个国家的公民，对该国家效忠并履行公民的责任，但同时可以属于不同的种族，认同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阶级和社会群体。它们之间并没有存在很大的矛盾和冲突（颜清湟，2012：11）。

本文的主角林文庆（1869-1957）为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中叶的新马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他集名医、殷商、社会运动领导者及教育家于一身，但他最让人啧啧称奇之处，莫过于身为海峡华人，一直以英皇子民身份为荣的他，最终选择从西学回归中学，并以儒家思想及价值观贯穿其一生。

有不少学者提出林文庆毕生经历了中西文化、地域、宗教及政治上的冲击与矛盾，在不同时期有着复杂多变的“身份认同”。然而，笔者以为，林文庆在拥有

各种不同的多重身份下，以其个人的主观意识，依重要性层次，选择了文化认同，确认了儒家思想为为人的导向。这就可以解释为何林文庆在拥有多重身份下，得以从容的应对当时东西方交汇下所衍生的现象与难题，并跨越地域（中国、英国及南洋）、种族（汉人、巫人、白人及海峡华人）、阶级（受英殖民政府扶植的海峡华人精英及不受英殖民政府青睐的中国移民）、宗教（儒教及基督教）等身份认同的迷思，怀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精神，展现其君子不器的风范。

时代造就了林文庆，林文庆也创造了时代。林文庆诞生的时候，英国一早向外扩张，中国已被迫逐步开放和改革，而新加坡则开埠多年，为英中势力所渗透。中英两国在新加坡展开华人归化和归顺的角力。林文庆在世的时光从十九世纪末横跨至二十世纪，他获得了殖民政府的栽培，再接受及回应历史与时代的挑战。更值得关注的是，整个历史与时代背景激发他展开寻找自我的旅程，并在确认了其文化认同之后，先是在华族色彩日趋褪色的海峡华人社群中播下儒学的种子，后更于一片“打倒孔家店”声浪中在厦门大学默默栽种儒学的幼苗。

本章主要探讨林文庆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生平际遇。我们尝试通过其所处的时代，探索他和时代的互动、时代对他的海峡华人属性与身份认同所产生的冲击与影响，以此进一步窥探其由西学回归中学，坚守宣扬儒家思想之路的缘由。

第一节 清朝末年时期的中国、英国与南洋（1840-1868）

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1911年间时期，中国因各种战乱及天灾等，造成大量华工移民南洋谋生。当时的中国，经济上是以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为主；政治上是在君主政体下的官僚制度，封闭僵化的中国文明在面对西方文明挑战下，其腐朽落伍暴露无遗。天灾人祸造成民不聊生，因此，许多中国人只好远渡南洋谋生（王秀南，1970：117）。

此时期南下的中国华人与旧时期移民海峡华人结合而形成一个独特的南洋华人社会。林文庆正是诞生于海峡华人家庭之中。有关于海峡华人这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有人称他们为土生华人（Peranakan Cina），有些人称他们为“海峡华人”（Straits Chinese）或者“海峡土生华人”（Straits-born Chinese），或“峇峇”（男性华人为 baba，女性华人为 nyonya 娘惹）（廖建裕，2008：103-120）。当华侨男子与当地的巫裔女子通婚后，所生之后代统称为“海峡华人”，他们所生之子女为“海峡华人子女”。新加坡的海峡华人多源自马六甲与檳城，是南洋最早的华族移民。此群体虽然不断膨胀，但一直是属于少数集团。峇峇的产生由来已久，而就其出现的最根本原因，自然始于中国人之移居南洋各地。峇峇的产生至少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即早期商人出于商业的目的而产生“住蕃”的行为，以及后期中国人大批被贩卖到南洋各地充当劳工，俗称“卖猪仔”的行为。古代的航海贸易，多利用有规律的季风行船，“中国商人在此期间，也已试行向国外发展，以谋取利

润。他们趁二月的东北季候风下南洋，趁四月的西南季候风返回本国。从大约十三世纪起，他们即开始在诸如单马锡（Tumasik）或旧新加坡、马六甲及爪哇等地，建立了居留区。”（巴素，1967：10）。有时如果错过了季风或是因为贸易因素而被迫滞留于当地进行商业活动，这叫做住蕃。有时候，这种住蕃可能会长达数年之久，住蕃的商人甚至于在当地娶妻生子，繁衍后代，这可被视为是早期中国移民在当地开枝散叶的开始（蔡佩蓉，2002：12）。

1914年2月，《海峡时报》刊载了一篇题为〈海峡华人的特性与倾向〉的专稿，当中提到“当那些走运发迹的侨民回国时，通常并不携带他们的家属同返故里，这就把他们的既得利益连同他们的子女都留在本殖民地了。各侨民区福建峇峇人数众多和家财殷实的原因就在于此。那些祖籍潮州、客家、广东和海南的广东峇峇与福建峇峇相处融洽，亲如手足，于是形成了一个利益和志趣完全一致的紧密坚实的社群。”（宋旺相，1993：415）。除此之外，后期大批华人劳工与当地妇女通婚，印证了“峇峇社会是在十九世纪时中国人大量移入马来半岛后才兴盛的”（陈志明，1984：167-192）。

本论文的主角林文庆出生于1869年。这段时期，正好是林文庆前一代人的事情，由此可以探讨他出生以前中国、英国及南洋所发生的问题及造成的影响。

东南亚是东西文化交汇点，也是东西文化互动和冲突的地区（颜清煌，2009：119）。西方殖民国家对东南亚扩张的重要而直接的动因是经济利益的需

要。随着殖民活动的开展，带有中世纪圣战色彩的宗教动因日益淡化、减弱，而经济动因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与更为重要的作用（梁志明，1999：11）。在政治上，东南亚各殖民地、保护国的政治体制形成，其基本特征是建立了隶属于宗主国国王或政府控制下的总督集权统治机构，一切大权包括行政、立法、司法、外交以及军事、安全等重要的权力完全集中于殖民地总督或高级驻扎官手里（梁志明，1999：20）。

十九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是英国史上最辉煌的年代。工业革命为它奠下繁荣富裕的经济根基，而经济雄厚、政治稳定提供英国向外拓展殖民地的条件。经过十九世纪数十年的努力，英国成为全球拥有最多殖民地的国家。欣欣向荣的维多利亚时代，其精神文化丰富多彩。各种意识形态如：功利主义、福音派教义、达尔文主义、怀疑主义、道德精神、女权主义等蓬勃发展，相辅相成，覆盖政治、经济、宗教、科学、社会和历史层面，而且影响深远。

英国殖民者于 1786 年在檳城建立殖民地，1819 年于新加坡建立殖民地，1824 年从荷兰人手中接管马六甲，并在 1826 年正式成立海峡殖民地。海峡殖民地的高级官员，根据英国政府的指示、个人的政治经验和哲学信仰来治理这东方社会（Edwin Lee, 1991：283-284）。

1857 年新加坡义学已改为新加坡书院。1863 年为了纪念元勋，男校又改名为莱佛士书院（Raffles Institution）；女校则改名为莱佛士女校（Raffles Girl's

School)。由于华、巫、印方言班的先后停办，现在已变为纯粹的英校了（王秀南，1970：124）。

1840年后，随着中国移民人数与日俱增，当地华人富商如陈金声（1805-1864）等创办了以教授四书五经为主的华文学校，如1849年创办“崇文阁”及1854年创立的“萃英书院”。当日私塾，教法保守：先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继而读幼学琼林、孝经，然后再读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纯用朗诵及强记的方法来背（王秀南，1970：124）。这些以弘扬中华文化及儒家道德价值的华文学校，冀望能以此推动读书风气。然而，受教育的中国移民仍是少数的。1860年标志着清廷对海外华民政变迁的分水岭。在这之前，清廷实施海禁政策，严禁移民出境。移民一旦出境，并在海外居住与经商，便视为天朝弃民，背叛祖国。弃民之在海外受人凌辱，甚至虐杀，清廷视若无睹，认为他们是咎由自取。然而，自1860年以后，清廷若干重臣逐渐认识到海外华民的重要性，由冷漠转为关注，进而实施保护政策，最终导致在海外设置领事馆（崔贵强，1994：169）。当时，第一个提出在海外设官护侨的官吏是广东巡抚蒋益澧（生卒年不详）。他主张以商护国，以官护商，以国家力量保护海外商人的利益。江苏布政使丁日昌（1823-1882）对海外华民具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认为他们可储为国用。他于1867年更提出具体的建议，主张在南洋设立领事馆，保护侨民，从而孕育侨民的爱国意识（崔贵强，1994：170）。

1860 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进军中国。清廷被迫签定了《北京条约》，该条约第 5 款规定“凡有华民情甘出口”，不论是单身抑或携带眷属，中国政府都必须“毫无禁阻”的准许他们出国，并准许他们与英国人“立约为凭”（刘彦，1962：47）。自此，中国移民涌入新加坡的数字日趋增加。

相较于中国移民，海峡华人虽属少数族群，但因为他们比中国出生的的移民更熟悉当地的语言、政治和商业情况，而且跟中国的关系比较疏离，于是成为殖民政府所要争取的对象。许多跟教育、文化和政治有关的笼络政策即此展开。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动荡时代，林文庆的祖父林玛彭（生卒年不详，福建省海澄人），于 1839 年南来马来亚槟榔屿，并娶了当地娘惹（nyonya）为妻。当生下独子林天尧（?-1881）后，全家就迁居到新加坡的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一带。林天尧曾受教于莱佛士学院（Raffles Institution），之后随父亲在当地著名华人领袖章芳琳（1825-1893）的商号工作。我们由此可见林家对教育方面是倾向让孩子受英文教育。在工作上，林玛彭管理酒税承包行，林天尧则负责处理鸦片承包行。此外，林天尧的妻子是马六甲娘惹，与陈祯禄（1883-1960）有着亲戚关系。

第二节 林文庆的幼年时期（1869-1878）

由于西洋列强的殖民事业在十九世纪时正值最高峰之际，故自《北京条约》签订后，以自由劳工或契约劳工身份出洋谋生的人数与日俱增。仅从 1860 年至 1880 年的二十年间，出境的华工就有五十万人，而后从 1881 年到 1930 年间，单单到达海峡殖民地的华工就高达八百三十万人（林远辉，1983：60）。

十九世纪末的南洋在政治与文化上，受到了中国和英国深刻的影响。英国开拓南洋，将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和文化模式移植到南洋，同时这也吸引了一些夹带传统文化南下的中国移民，也因此改变了数代生长于南洋的华族，包括海峡华人、中国移民的生活和精神面貌。

另一方面，中国执政者开始关注南洋华民，逐步加强与南洋的联系，努力伸展其政治与文化的影响力，使南洋形成祖国的海外助援队伍。1877 年 10 月 15 日，经过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1818-1891）与英国外交部数月的谈判，英国维多利亚女皇（Alexandrina Victoria）颁下诏书承认新加坡侨领胡亚基（1816-1880）为中国驻叻领事。但英外交部却附带一些条件，其中包括“中国驻新加坡领事只是商业代办，只限于照顾华人的商业利益，不得过问华人的政治事务。”（崔贵强，1994：171）。同年，英国亦在新加坡设立了华民护卫司（Chinese Protectorate），与中国同样的积极展开争取华人向心的斗争。

当时南来的先辈大部分是草根阶级的，因而在南洋形成了属于劳动群体的移民社会。1851至1891年间曾在海峡殖民地居留的沃恩（Jonas Daniel Vaughan），谈到海峡殖民地华人的职业从事情况时说“华人可以说无所不能；他们是伶人、卖艺者、艺术家、音乐家、药剂师、书记、管账、工程师、建筑师、测量员、传教士、僧侣、医生、教员、客栈主人、屠夫、猪肉贩、胡椒与甘蜜种植者、糕点贩、牛车与马车主、布贩、酿酒者、餐饮店主、鱼贩、水果贩、渡船夫、卖草者、小贩、商人与代理、油贩、鸦片馆主人、当铺商、售猪肉者、家禽者。他们是米商、船具商、店员、总销售商、酒店店员、仆人、木材商、烟草商、菜贩、种植者、市场菜圃人、劳工、烘面包者、磨坊主、理发师、铁匠、船夫、装订书者、鞋匠、木匠、家私匠、马车匠、修车匠、牛车与马车夫、烧炭者与炭商、棺材匠、糖果商、包工与建筑者、桶匠、司机人与火夫、渔民、金匠、枪匠与锁匠、烧石灰者、泥水匠、席与篮编织者、榨油商与矿工。除此之外，还有油漆匠、灯笼匠、搬运工、磨豆者、印刷商、硕莪、糖与甘蜜制造商、锯木匠、海员、造船匠、肥皂制造商、石匠、制糖者、裁缝师、制皮匠、洋铁匠、黄铜匠、制阳伞者、承揽殡葬者与墓碑匠、钟表匠、挑水者、樵夫与火柴商、雕木匠与象牙匠、相命者、杂货商、乞丐、流氓与小偷。”（Vaughan, J. D. ,1971: 15）。作者的描述大致反映了19世纪末新加坡华人在当地就业谋生的真实情况。

中国移民说的不是英语，而是自己的方言，主要是闽南话、潮州话、广东话、客家话和海南话。他们的子女进华校，学华语。这些人跟英国当局很少接触，

过着自己的生活。他们的效忠对象是中国，不是英国（李光耀，1998：100-101）。在南洋华人社群中培养出对清政府效忠的民族主义，乃始于1877年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之时。清政府的领事，在动员公众广泛支持方面，善于谋取社团领袖的协助。在皇帝和慈禧太后诞辰这类庆贺节日，清领事会召集他们一起庆贺效忠。在领事馆举行庄重的典礼，履行跪拜仪式。在一些特殊的节日，例如光绪皇帝的婚礼和登基庆典，则动员华人表忠，将该节日作为公共假日，商店和学校均关门，各家装饰花卉和灯笼，升挂龙旗，各街道上演专门的戏剧，供公众娱乐（颜清湟，1976年：20）。

从分授皇朝官衔中，华侨的上层社会的成员得到了声望和心理上的满足，使他们续愿意接近清政府（颜清湟，2007：112）。而当时的义学或私塾所采用的课本与学制，大都是因袭中国的。以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和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启蒙读物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增广贤文》等作为基本的教材。因为教育被局限于旧式的私塾；只有少数富裕人家的孩子可在家中学习；再有少数的子弟能回到中国为参加科举考试而准备（陈蒙贺著、胡兴荣译，2008：16）。这一时期的私塾没有政治色彩，只是读书写字而已。这一时期的私塾虽然从教学方法、学习内容、办学条件看来都不尽如人意，但对华人子弟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传播中华文化起一定作用（周聿峨，1996：45）。

另一边厢，从早期清朝的遗弃，直至英殖民政府开始为新加坡引进的英国式行政、教育、生活方式、1867年归化条例第八项（Article VIII of the Naturalisation Ordinance）等条例，在实际上给予了海峡殖民地华人英籍民身份及伴随该身份而获得的种种特权。这些特权包括出任立法议员、市议员、在华人参事局工作及获得英国勋衔的机会（陈志明，1984：167-200）。种种因素所带来的现实与生存考量，加速了海峡殖民地华人的英国化进程。因此，许多华人把孩子送进英校，希望子女将来能在以英语作为行政语言的殖民地当专业人士和政府雇员（李光耀，1998：100-101）。由于受英文教育和处在西化的海峡殖民地时代，他们的思维、生活态度与行事风格更倾向西化。而这批受英文教育的第二代土生华人也顺应当时环境与时代的需要，迅速的崛起成为了商业与社交的精英阶层。

这时的殖民政府政权日趋强大，而属于较少数的海峡华人群体受英国教育政策的影响，英语已成了受过教育的海峡华人的主要语言之一。他们在经济上与英国人合作，在政治身份的认同上以英皇子民自居，而英政府也把他们的领袖当成华人代表，委任他们担任政府华人事务咨询委员、海峡华人咨询委员、市政局议员和海峡殖民地立法议员等职务，这个时期的峇峇华人成了华人社会的优越阶层（Superior Stratum）（陈志明，1984：167-200）。“虽然土生华人穿长衫、瓜皮帽，如同中国人”，但当土生华人被当成为中国人时，他们会“以不满的语气表示他不是中国人，他是英国臣民（British Subject），乃白人（Orang Putih，马来语，Orang 指人，Putih 指白）。土生华人所组织的俱乐部亦不让新来的中国人参

加。在俱乐部中，他们打桌球、保龄球，喝白兰地、苏打水等，生活相当洋化。”

（Vaughan J. D. , 1879: 4-5）。由此可见，海峡华人当时已呈现出高度隐藏或褪去华人身份的普遍性。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本论文的主角林文庆，字梦琴，于 1869 年 10 月 18 日诞生于新加坡，是当时第二代在南洋土生土长的海峡华人。林文庆排行第三，有两位兄长、两位弟弟与四位妹妹。在林文庆八岁那年，母亲不幸逝世。之后，父亲续娶妻姨，再为林文庆多添了三位妹妹。家中环境富有峇峇家庭特色，祖母、母亲和七个妹妹都作娘惹打扮，口操峇峇语（李元瑾，2001：43-44）。

值得一提的是，祖父林玛彭是位文人。因此，林文庆可说是生长在“中国化的峇峇家庭”。由于父母早逝，林文庆的启蒙教育就是祖父的身教言教（新加坡图书馆编委会，2007：21）。林文庆幼年时曾在福建会馆附设的书院念四书五经，而当时福建会馆主办的两间华文学校，就是在天福宫内的崇文阁和厦门街的萃英书院。但不久他就考入克罗士街政府学校（The Government Cross Street School）受英文教育（宋旺相，1993：198）。他在 1879 年升入莱佛士书院。明明身处西式教育的洪流之中，殊不知，远赴英国留学，竟然是林文庆与中华文化奇遇的契机。

第三节 探寻人生方向的求学时期（1879-1895）

十九世纪末中国驻新领事与华民护卫司就华族事务方面的争夺，在左秉隆（1850-1924）任期内，是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展开。左领事深切地意识到教育与思想灌输的重要性，于是在他莅任的第二年（1882），设立会贤社，作为一个成人教育机构，每月出课题一次，亲自评改课艺，且将自己的薪俸捐作奖学金，以勸士子。此外，他更竭力展开兴学运动，在他任内，前后兴办起来的义塾计有：一、陈姓族人所办的毓兰书室；二、广肇商人所办的进修义学（也称广肇义学）；三、小坡华人公立的乐英书室；四、颜永成独资创办的培兰书室；五、章苑生独资创办的养正书室；加以家塾讲帐之设，一时学校林立，弦诵之声，相闻于道（柯木林、林孝胜，1986：120）。

由于“护卫司专管华人一切事”（[清]李钟珏著、许云樵校注、陈育菘主编，1947：5）。再加上“西官又好揽事权，必欲华官仰其鼻息。”（[清]李钟珏著、许云樵校注、陈育菘主编，1947：6）。因此，左秉隆担任领事期间，受限于华民护卫司的种种牵制，“故除发船牌外，惟劝兴义学，讲圣谕、开文会，以行教化而已（[清]李钟珏著、许云樵校注、陈育菘主编，1947：6）。

对于海峡殖民地政府而言，左秉隆在新加坡所举行的鼓励兴学、振文教等政策，都是中国领事逐步培养一种亲中国的爱国精神，欲左右华侨思想及效忠对象的

企图。为了不让中国领事彻底控制华族社会，殖民地政府苦思对策，最终决定分化华族社会。1887年，英政府设立英女皇奖学金（Queen's Scholarship），每年选派华族社会中的优秀分子，前往英国深造，为华族社会制造领袖，灌输亲英思想（柯木林、林孝胜，1986：121）。对英殖民政府而言，其首要之事无疑是要确定这一举足轻重的社会集团对于他们置身于其中的异国文化，和对于统治他们的政府抱何种态度（宋旺相，1993：415）。

因殖民地政府的刻意笼络和扶植，海峡华人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教育各方面最受恩宠，也最有势力。当时新华社会的领导层和杰出知识分子群绝大多数出自海峡华人社群。其中知识分子群的形成跟英文教育的发展有着绝对的关系，1860年莱佛士学院的稳健发展和1887年女皇奖学金的设立更是催生因素。如此一来，海峡华人很自然的对英国产生了认同，去汉化的心态日趋明显。

我们从宋旺相以下的文章可发现，海峡华人与中国移民之间的差距正逐渐扩大。“近来中国政治形势的剧变，对这个正在勤勤恳恳、脚踏实地、稳步前进的集团几乎毫无影响。他们对于革命者的奋斗目标和计划有几分同情，并不足为奇。但他们绝不会自愿响应一群盲目狂热、想入非非的阴谋家的号召，而不顾个人安危，去冒倾家荡产之风险，这也是完全可以断言的。与他们这种漠然处之，无动于衷的行为相反，半岛矿场上的苦力们刚得到一点消息，便热情高涨，主动积极地行动起来，为了革命，他们自觉地捐献自己几个月的劳动所得，志愿加入革命军队。相形

之下，二者在教育水平与经济状况上的巨大差距，令人震惊。”（宋旺相，1993：415-416）。

“在体质上，海峡华人可能不像生于中国的同胞那样能吃苦耐劳，那样坚韧不拔。因此，他们没有从事体力劳动，当熟练技工或小商贩。但是在雇用了许多非熟练华工的园丘、矿场和工厂，他们作为翻译员、书记和中间人，则是必不可少的。在码头和货船上，他们是仓库管理员，是点货员，是商务负责人。当你看到过磅员和点货员在码头上履行其职责时，看到他们以其沉着冷静，而且机敏执着的精神，将杂乱无章的货物标签及一连串号码准确无误地一一查核；并打上新标签时，你就会意识到，尽管他们或许未能增强其种族的特质，但他们仍完整无损地保有其种族机警敏锐的特长。”（宋旺相，1993：416）。

文章进一步对海峡华人的信仰作出阐述：“在风俗习惯、心理特性及宗教信仰方面，他们与在中国出生的华人并没有显著差异。”（宋旺相，1993：416）。

“人们很容易发现他们同样具有亲如兄弟的民主精神，同样对长者和智者包含敬意，同样遵循拜访礼节，遵循中国祖先崇拜的礼仪习俗。”（宋旺相，1993：416）。“就宗教信仰而言，海峡华人可能被视为不拘泥于教条及形式的人，他们在圣母祭坛前和在著名的拿督公庙里点燃蜡烛膜拜。然而，尽管传教士作出了巨大努力，他们仍然对于神圣的信仰或地狱的恫吓一概漠然视之。”（宋旺相，1993：416-417）。

文章最后的重点在于鼓励海峡华人学习中华文化。“然而，在教育方面，他们竟大胆的背离其邻人的常规。为了取得他们现有的地位和保有所积聚的财富，同时也为了使最终所具有的系统性文化能奠定坚实有力的基础，他们较喜欢让自己的孩子接受良好的英文教育。”（宋旺相，1993：417）。“他们不时要求技术教育，提高教育水平。但总的来说，他们对于完备而实用的商业训练还是满意的。”（宋旺相，1993：417）。“但是，很遗憾，他们忽视向青年一代教授适当的中文知识，或对此不加鼓励。”（宋旺相，1993：417）。“但是，千万不可忘记：中国礼义忠孝之魂和对于文化素养的要求，如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宋旺相，1993：417）“对一个华人来说，倘若他无法从祖国文化中获取激动人心的力量，事实上无异于失去独立民族资格。”（宋旺相，1993：417）。

林文庆自小接受正统的英文教育。在师长们的关怀鼓励下，1888年，他是首位荣获英女皇奖学金的海峡华人子弟，有机会远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学医。这是最早的“高等”奖学金，这种奖学金是由丝丝·史密斯爵士在前一年创设的（宋旺相，1993：198）。

林文庆英式教育背景，使其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六年的英国留学生涯，让他亲眼目睹了英国的繁荣昌盛的同时，也加强了他对英国政权和西方文化的良好印象，尤其包括这时英国的女权运动。它从争取教育权到职业权到参政权已有一定的成绩；妇女教育更是获得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从初级学校到中学到大学已具规模。与此同时，西方列强争相向衰败的中国伸出爪牙，英国也不例外。英国上下对

中国事务充满关注，林文庆也深受吸引，开始注意到中国内忧外患的问题，而中国的妇女运动亦正开始酝酿萌芽，此可见于维新派领袖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和谭嗣同（1865-1898）主张男女平等，提出尊重女权和兴办女学的理论。

学成后回到南洋的林文庆不负殖民地对他的栽培，积极发挥了他的作为新一代海峡华人领袖的作用，号召海峡华人改革志士倡导一系列的改革运动，开始认真探讨族群内积弊已久的社会问题，其中包括伦理教育、女学教育、儒教运动、学习中文、反鸦片及去辫子的课题（李元瑾，1995：页 253）

第四节 型塑林文庆人格特质的成熟时期（1896-1937）

正当中国“洋务运动”抬头的时候，清廷撤销了数百年来海禁。这群离乡背井的中国人，由被摒弃的移民变成被争取的良民。这个策略，唤醒千千万万漂流在外的华人。事实上，这一个返回故国的归顺运动，正是和英殖民政府的归化政策形成一个尖锐的对立，为新华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从 1890 年至 1911 年，清皇朝使节对新加坡和马来亚有六次主要的访问。这些访问都有政治目的。他们意图在海外传播中国的威望和培养亲清政府的华侨社

会。皇朝特使的访问，也吸引了通常是华侨社团领袖的商人对皇朝表忠。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买得清政府的官衔，他们穿着官服，集结在码头上来欢迎显贵的访问者。随后由清领事或是著名的商人举行宴会，向皇上和清政府表达许多效忠誓言。在这样的一些场合上，甚至还发生了一些政治上通常是效忠于大英帝国的当地一些侨生领袖，也表示效忠清政府。这反映了侨生华人中的一些认同问题（颜清煌，2007：105）。

中国近代，最有名的孔教倡导人是康有为。他企图把儒教加上西方教会的制度和仪式而改造成符合当代意义的宗教。希望能借此与西方宗教抗衡。他的倡议得到了热爱祖国的海外移民的认同与积极配合，身在南洋的邱菽园正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与同样以改革运动为目标的林文庆，携手倡导了孔教运动与女学运动等系列的运动。

然而，由于进入民国之后的国教运动失败以及涉及帝制、复辟等政治问题，孔教在中国旋即告终。南洋孔教复兴运动也因为数种因素，其中包括邱菽园与康有为的关系决裂，孔教运动除了林文庆之外，也缺乏献身的领导人来贯彻执行其计划等因素而沉寂下来。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梁启超对孔子学说的态度突然改变而饱受冲击。在 1902 年，他在一份日本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保教非尊孔论〉时就表现了他的转变。新加坡的《天南新报》转载了该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否定了他以前的见解和立场，并辩说没有必要将孔教变成国教，因它

会剥夺中国人民的自由思想。梁启超的著作在华侨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态度的剧变，粉碎了他的许多支持者的信念，阻止他们支持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的运动。

事实证明殖民地政府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是成功了。因为在廿世纪初期，这批从英国留学归来的精英分子如宋旺相、伍连德（1879-1960）等，不仅成了当年侨生社会备受敬仰的风云人物，同时也是各种社会改革运动的中坚倡导者。他们在1900年组成海峡英籍侨生公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柯木林、林孝胜，1986：121）。藉以团结受英文教育的海峡侨生。这样一来，新一代的精英分子，使得新加坡华族社会开始分化。最忠心的海峡华人纷纷加入海峡侨生公会，人称“皇家华人”。但“皇家华人”只占华族人口十分之一左右，其余是新近到新加坡、说中国话的华人。林文庆不仅是这个群体的核心人物，亦是当时极少数可以游走于海峡华人群体及中国移民的社会领袖。

这群海峡华人精英对其社群有着深厚的忧患意识，积极推动改革运动以巩固其社群受殖民地政府重视的特殊地位。诚如担任爱德华七世国王纪念基金总委员会主席及立法议会议员的贝克先生（The Hon. Mr S.T.Baker）自这殖民地退休要离开的前夕，在致辞时所表示的“在新加坡的华人，我总觉得和他们接触交往实在是我最大的幸运，不论是在公共的事务上或在生意的业务上，在这五年中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证明了他们是最诚实最可尊敬的人，我确实可以借我们在上海的前经理，即已故的依文卡梅伦爵士（The late Sir Ewen Cameron）形容那里华人的那些话‘他们的话同他们的契约同样是有有效的。’”（宋旺相，1993：375-376）。

在这段期间，林文庆有两段婚姻。1896年12月，林文庆在乌节路长老会礼拜堂（Orchard Presbyterian Church）与黄乃裳（1849-1924）的女儿黄端琼（1874-1905）结为夫妻，夫妻恩爱、家庭和睦。可惜，黄氏的身体虚弱，1905年离世，遗留四子，即可胜、可明、可能和可卿，其中长子可胜是国际闻名的生理学家，成就最大。1908年，林文庆在好友殷雪村医生的撮合下，娶其妹殷碧霞（1884-1972）为第二任妻子，与林文庆育有一子一女，即炳汉与月卿。殷氏的性格骄横，且重视现实利益，经常约束丈夫的言行与财物，夫妻间的关系紧绷。

另一方面，林文庆不仅发动海峡华人为英国效力，亦曾亲身参与过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党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的运动。从甲午战争至二次大战前夕，他都直接或间接的参与中国事务。林文庆毕生从事对儒家思想的研究和著述。他在这一时期致力于向受英文教育者及西方人士介绍和传播儒家思想，扩大了儒家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和影响，这也是他对儒家思想的一大贡献。他一生以英文写作和翻译了大量有关儒家思想的著作和文章。他有关儒家学说的英文专书及翻译的屈原〈离骚〉的作品，深获西方人的好评。这方面的贡献也是今人不应忽略的，笔者将在本论文的下一章有更进一步的阐述。

林文庆在1921年，即52岁那年应陈嘉庚之邀，抛下了在新加坡如日冲天的声望及在商界、医界和政界的事业成就，携家人前往厦门，担任校长一职长达十六年。其间历经两次学潮，震惊全国学界，让刚刚步上正轨的大学差点儿因此倒闭

（严春宝，2010：131-176）。此后，厦大又因陈嘉庚事业受挫而一再面对经济困境，林文庆却坚守岗位，为了培育“君子”的教育理念而不轻易厌弃。后来的厦大在林文庆的领导下获得“南方之强”的美誉。

第五节 迈入古稀之年、重返南洋时期（1938-1957）

在林文庆和全体厦门大学学人的努力下，私立的厦门大学一直勉力撑到 1937 年。林文庆在校主陈嘉庚的委托下，于 5 月份代表陈嘉庚从厦门亲赴南京，经过多次与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的请示与协商，于 7 月份将被誉为“南方之强”的私立厦门大学交归国有（严春宝，2010：174-175）。

厦大改为国立后，已经两袖清风的林文庆带领家人重返新加坡，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以当时林文庆的身份地位与财力而言，他已不再是南洋华社的风云人物。但作为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者，他时常受邀出席一些有关教育、文化和宗教有关的活动，其间对民众发表讲话及在广播电台演讲。

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渐猖獗，林文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号召民众抵抗侵略与暴虐。1941 年底，日寇突袭马来亚半岛，在短短不到七十天内占领新加坡。往昔那些社会闻人侨领此时都不复出现，因此，林文庆在集中营被日军发现后，日

军以其家人及其他华侨的性命安危威胁他出任华侨协会的会长，并逼他领导华侨协会筹集五千万的奉纳金献给日军（严春宝，2010：256-265）。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后，由林文庆所创办的实得力孔教会（取自英文字“Straits”的谐音）的会务与其他组织、学校一样全部停止。直到1949年才恢复其运作，改名为“新加坡南洋孔教会”（徐李颖，2010：213）。同年，他被刚刚成立的中国学会推举为第一任会长，旨在促进人们对中国文物、语言、文学、历史的研究。

林文庆在日本占领新加坡的三年半时间期间倍感煎熬，这使得战后的他逐步退隐。1957年1月1日，林文庆因心脏衰竭逝世，享年88岁。新加坡所有的中英文报如：《海峡时报》、《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南方晚报》等都以极显著的篇幅为林文庆这位“新加坡的圣人”哀悼。

第三章 林文庆及其多元才性的展现

林文庆是十九世纪末在南洋深受瞩目的风云人物。他的专业是医学，但他所展露的锋芒却不仅局限于医学领域。林文庆一生中在医学界、教育界、商界、社会改革运动等，为社会、国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与卓越的贡献。

第一节 悬壶济世的林文庆

十岁的林文庆在莱佛士学院求学，遇上了影响他极深的胡列特校长（R.W.Hullett）。胡列特校长利用自己空闲的时间教导林文庆，要他到自己家里补习，并让他分享自己的藏书。当“八岁丧母、十岁无父”的林文庆面对辍学困境时，胡列特校长赶紧拜托林文庆祖父与父亲的雇主，即当时的华侨社会领袖章芳琳（1825-1892），请他劝说林文庆的祖父母让他完成学业，才使林文庆不至于停学。根据资料显示，林文庆在 1886 年，在班上名列第 13 名（宋旺相著、叶书德译，1993：198）。然而，在对他关怀备至的胡列特校长的激励下，在短短一年之内，林文庆力争上游。1887 年，他是首位获得英女皇奖学金到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攻读医科的年轻人，并在英国见证了盛大的维多利亚女皇即位五十周年庆典

(Golden Jubilee)，这也开拓了他的视野。林文庆在留英期间也得到几位教授的关爱，如他的奖学金捐助人之一莫特教授 (Prof.Mott)、巴伯博士 (Dr. A. H. S. Barbours)、剑桥大学病理学系主任罗依教授 (Prof. Roy) 等 (宋旺相著、叶书德译, 1993: 235、339、340)。年少时期的林文庆，学业一帆风顺，并有机会接触到多位有学识涵养的知识分子，受益匪浅，从而奠定了他往后在医学界行医与研究工作上的使命感。

1892 年，他考取医学内科荣誉学士学位和外科硕士学位，因年年名列榜首，故 23 岁的他又荣获安东金奖章 (Antoll Medal)。此外，他还担任过皇家学会主席和爱丁堡大学图书馆管理人 (李元瑾, 2001a: 44)。同年，林文庆接受病理学系主任罗伊教授 (Prof. Roy) 的邀请，到剑桥大学病理学系参加研究工作，并在皇家学会的《哲学会报》 (*Philosophic Transaction Of The Royal Society*) 发表〈论犬类心脏的神经〉 (On The Cardiac Nerves Of The Dog) 和〈蚯蚓的黑色液体及其保护机制〉 (The Colemic Fluid Of Lumbricus Terrestris In Reference To A Protective Mechanism)。

1893 年 3 月 20 日，《叻报》刊登林文庆光荣返回新加坡的新闻。隔年，25 岁的林文庆与爱丁堡大学同学罗伯逊医生 (Dr. T Murray Robertson) 设立西药房 (The Dispensary)，业务兴隆。作为一个华人，居然能开设西药房，这在当时新

加坡真是了不起的事（严春宝，2010：32）。在同年的3月14日，《叻报》刊登了一则有关林文庆根据自己对犬类的研究经验，以狗肉为药，治愈了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1848-1905）肺病的事，而获其赠送“功追元化”的匾额，当中的“余既喜君从三万里外学成而归，上追二千年绝业，洞见症结，手到春回。不为君幸，兼为华人幸，故乐志之。”高度赞扬了他的医术。此事证明了林文庆虽学习西医，但却不一面倒的认定中医迷信落后。这一种见解，一直到他本人后来执掌厦门大学，设立的医学院都依然没有改变。

1896年，林文庆与詹斯医生（Dr. Janz）及地方政府首度主持全市健康调查，收集了大量极有价值的医学资料。他们的调查第一次科学性的揭示了当时新加坡的高死亡率，部分原因乃是由于霍乱引起。之后，他负责调查新加坡无牌照医生，亦专为“患有严重疾病的妓女”建立一家私立医院，负责为染上传染病的妓女签发死亡证书。通过这样合作的契机，英殖民政府开始意识到林文庆作为华人医生的巨大社会价值，从而为其往后的政治生涯奠下了基础。此外，为了提高民众的健康醒觉，林文庆亦多次公开发表有关医学、健康课题的演讲，其中包括肺结核（Lim, B.K., 1901b: 123）、消化（Lim, B.K., 1899a: 75）等。

1904年，三十五岁的林文庆与华社领袖陈若锦（1859-1917）集众人的力量，向总督提出办医学院的请求，并积极展开筹款活动。他们筹集到超过七万一千元的

开办经费，遂创办了英王爱德华七世医学院（The King Edward Medical School），也就是今日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的前身。他于 1907 年-1910 年在英王爱德华医学院义务讲学，并在 1918 年 6 月被委任为英王爱德华七世医学院的董事。

此外，林文庆就任厦门大学校长之后，认为当务之急是先为厦门设立一所一般人都负担得起的医院。为此，林文庆利用学校假期，专程前往南洋筹募资金。新加坡华文报纸《新国民日报》1926 年 2 月 10 日所刊登的〈厦门大学公医院鸣谢启示〉中提及林文庆本人带头亲自捐献了一千元，最后实际筹获的捐款为六万元。

1930 年，林文庆联合厦门各界有识之士，为弘扬孙中山先生（1866-1925）“天下为公，造福社会”的精神，共同倡议设立中山医院，而林文庆被公推为厦门中山医院董事长（严春宝，2010：37-38）。厦门中山医院于 1933 年正式开诊，林文庆先后从新加坡、香港等地聘请不少医学专家，组成强大的医疗团队。林文庆不仅有严谨的治学行医理念，更实行了对“贫民无力出资者概予免费”的治疗，并主动承担起为地方培训医务人员的任务，因而在医院内附设了一所护士学校。当时的厦门，霍乱、白喉、乙脑及痢疾等疾病肆虐。有一年流感爆发，医院的地上、走廊上全都是病人，中山医院的医护人员依靠听诊器、体温计等简陋的医疗设备，救治了无数的病人，而且还创造了没有一个医护人员被感染的奇迹（严春宝，2010：61）。林文庆一手策划成立的中山医院于 2001 年被正式命名为厦门大学医学院第一临床医院。2005 年，中山医院正式成为厦门大学附属医院，更名为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据《厦大周刊》第 249 期的记载，林文庆曾于 1930 年接受漳州闽南医院的邀请，担任该医院的名誉董事。此外，林文庆曾积极参与创办 1931 年的厦门鼓浪屿医院的活动，并在该医院开诊。该医院后来易名为鼓浪屿平民医院，凡贫困者来院求医一律免费，就连住院时期的副食费也免去（严春宝，2010：39）。

林文庆行医之余，还积极的展开学术研究，他先后在《海峡医学协会学报》、《天南新报》、《日新报》及《海峡华人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有关医学的学术论文。另外，林文庆还曾在 1911 年奉肃亲王之谕出任清廷政府内务部医务顾问及北京西医院监督，并在同年，奉清廷派遣出席在巴黎和罗马召开的国际医学会议，并曾往德国雷士丁万国卫生博览会任医务主任（严春宝，2010：36）。

林文庆在抵达厦大不久后，发现一些北方来的学生，因为厦门天气闷热，湿气很重，而患上了奇痒无比的“香港脚”，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因此，林文庆细加研究，在 1921 年发明了专门医治“香港脚”的药水，取名“A.U”（厦门大学的英文简称）。1926 年 2 月，五十七岁的林文庆获颁医学和外科的名誉院士学位。1930 年，林文庆被英国外科医师学会招纳为正式会员。

除了发明药物之外，林文庆还以自己专业的医学知识，深入浅出的向民众推广及解说注重家居与环境卫生的重要性。《防疫说》（林文庆口述、侣影道人笔录，1898：1）是由林文庆口述，侣影道人做笔记，并刊登在《天南新报》。当中提到患疫的“华人中尤以贫浊尤多，是缘贫户屋小人稠，且多污浊故也”。林文庆提醒民众“先使屋宇洁净清风时来使多空气入屋及日光所照则不生此菰”。若家里有人因患此病而逝世，“故人有疫死所御衣物必须火焚为要”，“否必日晒，然亦但上向受日能净而下向阴暗菰仍附存，纵包裹逾年驰越万里着于人身则又活矣。”林文庆本着爱民之心，“特以此告吾华防患未然”。

另外，林文庆曾编写了一份《普通卫生讲义》。而他撰写此书的用意何在呢？其实，这些问题可在该书的自序中得到答案。他说：“途经沪上，浏览书坊，尚乏成本，间或有之，仍不过略延身体公用之理，而于个人及公众卫生之概要，尚未详及。文庆引为已憾。迄小春之杪，行返鼓浪，洞天尝察鹭江，街途臭污，不可响迹。于卫生上，极为腐败，今昔无殊，且闻每年人数疫亡，几达数千，心焉恫之。爰向有力之绅董，劝办卫生，只以驻屿日短，未能就绪，窃谓如将卫生大意，揭饷同胞，未必不无少补用，是不揣冒昧，尽一星期辰夕口述，并延惠安中舍徐师经邦笔录，以成是书。”在林氏自序中，明白地告诉我们，这本《普通卫生讲义》乃是他通过口述，由许经邦（生卒年不详）笔录后，再得当时中华总商会秘书林癸荣先生（生卒年不详）的润饰而成（庄钦永，1990：162-163）。其目的是要厦门

的百姓关注环境与个人的卫生问题，提升大众的卫生知识及健康水平，以减少患疫的机率。

林文庆除了行医，还进行医学的发明研究、发表医学论文、参与国际研讨会、了解中医领域、筹划全市健康调查、创办医学院等等。此外，他并不仅仅守在医学界享受名成利就的滋味，反而进一步迈向了商界、政界、社会改革运动与教育界，丰富了自己的一生。

第二节 长袖善舞的商人

林文庆的朋友众多，包括了在医学界、政治、报业、文化、教育、商业的人士，他本人在商场上也相当活跃。

1896年，林文庆结识了植物园长李德利（H.N.Ridley），并在其介绍下，开始思考橡胶的经济价值。他采集各式的土地样本，认真地作研究。同年，二十七岁的林文庆劝陈齐贤（1870-1916）试种树胶，共同在新加坡杨厝港开辟树胶园，合

资成立联华树胶有限公司，两人因而被尊为马来亚树胶之父。1908年，林文庆联合其他华商集资创设了三巴旺树胶有限公司，任用林义顺（1879-1936）担任经理，大量收购当时低价的菠萝园改种橡胶。1920年的时候，橡胶园的规模更是一跃为20,000多英亩。

1912年9月，林文庆联合李俊源（1868-1924）和林秉祥（1872-1944）出资一百万成立“华人商业银行”（The Chinese Commercial Bank Ltd.）。“和丰银行”（Ho Hong Bank）于1917年7月的创立，也有赖于林文庆、林秉祥及林秉懋（1884-1960）。“和丰银行”还同时在马六甲、麻坡等地设立分行，不管是在资金还是规模方面，都超越了以往的那些当地银行。1919年10月1日，林文庆联合丘国瓦（生卒年不详）、林义顺、殷雪村（1876-1958）筹组“华侨银行有限公司”，并担任第一任主席。1920年，林文庆出资四百万，担任和丰银行首席董事，并在同年2月集资筹办新加坡第一家由华人开办的综合性保险公司“华侨保险有限公司”，并被委任为公司董事。1921年，五十二岁的林文庆将和丰银行、华侨银行及华商银行三家合并，而有了今日的华侨银行（Oversea-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至今仍贵为新加坡著名的三大银行之一，其标语口号为“新加坡成立最早的本土银行”（Singapore's Longest Established Local Bank）。

1914年8月4日，英国和德国宣战。战争爆发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财政信誉良好的华商银行遇到了挤兑风潮。银行面临的问题部分归因于许多商人手头积聚大量现金，而不将其存入银行。林文庆当时担任该银行的副董事主席，在危机爆发后，联同董事会成员向政府请求临时援助，并在政府核查该行帐目之际，关门停业。两周后，政府已详尽核查了华商银行的帐目，认为其资产超过负债，因此承诺一定按该银行帐在合理期限内筹集到现金数额，贷款给它。政府授权该银行按常规方式收回它的所有债款。同年10月1日，银行重新开门营业。多亏“在开业的头五分钟内，存入的钱款多于付出的现金，而且整个上午的业务都进行得相当顺利。”（宋旺相著、叶书德译，1993：418-419）。在林文庆等人的领导下，华商银行最终得以安然度过了难关。

林文庆亦曾担任锡业公司、船运公司、工厂的董事。他既是新加坡联合锯木场的创建人之一，也是海峡贸易有限公司和东方碳矿场的股东。除此之外，中华总商会于1906年创办，而林文庆亦是当时的创始人之一。两年后，林文庆作为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的代表，出席了上海的世界华人商业大会。

另外，林文庆与宋旺相（1871-1941）于1897年4月，携手创办了英文杂志《海峡华人杂志》（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并在每期杂志封面的正中央位置印上孔子的“过则无惮改”五个中文字，旁边则英译为“If you have faults, do

not fear to abandon them.”，而它也成为了社会领袖宣扬改革运动的喉舌。他先后在《海峡华人杂志》发表大量的文章，其中包括教育改革、伦理教育、母语教育、女学教育、尊儒教、反鸦片、去辫子、反缠足、改衣着等。

1898年5月26日，新加坡华侨邱菽园创办《天南新报》（Thien Nan Shin Pao），直至1905年停刊。邱菽园不但是《天南新报》的创办人，也是总主笔，并延聘徐季钧和王会仪为编辑，陈德逊任总经理，并请当时的市议员林文庆为顾问。每日出版四小张，用一种薄纸印刷，只能印一面，高十一英寸，宽十四英寸，可说是一种小型报纸。此外，在《星报》宣布停刊后，由林文庆与其岳父黄乃裳接办，改称为《日新报》（Jit Shin Pau）。1899年10月5日的创刊号，列明第二八七六号，继承《星报》报期，无疑是《星报》的继承者。但在内容上却耳目一新，增加了国际新闻，西方科学与技术知识等的报导。林文庆博士还曾亲自撰译一篇连载的科学小说，目的在于改变当时华人的落后思想。《日新报》后来经营到1901年8月31日，因经济困难，自动停刊。

在商业领域中，比林文庆富裕或拥有权势的豪商为数不少，但凭着他卓越领导与杰出的外交才能，他成为了大家在商业上所敬重的智囊团代表。在商场上，“他是他们的智囊，同时是外交能手，所以重要的决议，都要先请教他。”（超，1957：9）。中华总商会会长薛中华（1885-？）曾表示：“我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他以其聪明才智，欣然为我们商会的一切事物作出宝贵贡献，真是难以胜数。”在大家眼里，林文庆“以其丰富的阅历，赤诚的爱国之情，根据崇高的原则与合理的常规，为商会托付于他的一切事物献谋划策”（宋旺相著、叶书德译，1993：432）。

第三节 涉足政界、为国为民

林文庆一方面不忘英国殖民政府的栽培，响应英政府的召唤，在南洋领导新加坡社会的改革，另一方面则回应祖国，为中国的政治与教育尽一分力。

1895年8月，二十六岁的林文庆首次获推选为“海峡殖民地立法议会”的非官方华裔议员，并在往后的1898年、1901年及1915年数度当选。作为海峡殖民地立法议会中唯一的华籍议员，林文庆所代表的是新加坡、檳城及马六甲的华人。这一职位的设置，使华人社会与政府之间有了一座可沟通的桥梁。身为议员的林文庆，在其就任期间，为华社争取或修改数项重要的议案，其中包括倡议修改“破产法案”成功（1896年5月）、争取华人在市区“建设私人坟场”成功（1896年7月）、反鸦片、修正“放逐法令”成功（1899年）、废除“公然扭辮”成功（1900年）、在1901年10月的预算案辩论会上，诉求政府改善莱佛士书院的发

展，并在 1903 年争取成功、倡议通过“增租法案”成功（1917 年 6 月）等等。而林文庆在立法会议上表现的雄辩滔滔与才智兼备颇让许多人折服。

身为医生及社会领袖的林文庆，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反鸦片的演讲。他不仅从医学的角度论证吸食鸦片对健康的危害，更提及鸦片会使人完全丧失其道德意识，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行为举止（Lim, B.K., 1898: 51）。他对于海峡殖民政府无意阻止及预防民众染上吸食鸦片的陋习感到愤怒，并认为海峡殖民政府必须对吸食鸦片者数目的不断上升，负上最大的责任（Lim, B.K., 1898: 47）。

在中国发生革命之前十二年，林文庆即率先展开反对留头髻（辫子）运动。尽管遭到一些富有影响力的华人的愤怒反对，他还是说服了一些追随者剪掉辫子，以表示他们确实准备实行必要的社会改革和其他改革。在满清被推翻不久后，马来亚华人，除了人力车夫和其他少数人以外，都效仿现代欧洲人的剪发方式了（宋旺相著、叶书德译，1993：198-199）。

早在 1895 年 1 月 11 日，林文庆于海峡殖民地协会在市政厅召开的民众集会上，因抗议殖民地对英国军费的负担而得罪了当时的总督米歇尔（Sir Charles Mitchell）。当时 8 月份即将退休的华人议员余连城（1850-1925）提名林文庆接任自己的职务，另一位曾担任非官方议员的著名华人领袖陈若锦亦表示支持时，总督

米歇尔却因为林文庆对于英国军费的大胆抗议言论而差点否决他的资格。当人们听说总督不愿接受林文庆时，许多人纷纷投函报社替他鸣不平。其中《海峡时报》以林文庆“曾受西方的科学训练，而且雄辩滔滔，可能比其他的海峡华人更适宜于参与立法议会中的辩论”为由，而力劝总督接纳林文庆担任议员。林文庆年仅 26 岁当选立法议会的非官方议员是一项壮举，亦颠覆了两项传统：其一、华人根深蒂固的一个传统是以老为尊，以推选德高望重的长者为例。其二、林文庆得以担此重任，其更接近“学而优则仕”这一种模式。与以往相较，担任议员的华人领袖，多为富商巨贾，都是循“商而优则仕”的方式。而林文庆当时回返新加坡仅两年，虽通过行医积财，但仍不算是富翁，他是以其丰富的学识及过人的魄力成为新一代的华社领袖。

1895 年，康有为在上海创办“强学会”以宣扬儒学。1898 年，康有为在其“百日维新”的高潮中试图定孔教为国教、立教部、建孔庙，并以孔子诞辰为国立假日。1899 年 9 月 6 日，林文庆则创办了“华人好学会”。“好学会”在报纸上发表宣言强调它是一个注册登记的团体，每月在《天南新报》办公室和恒春商店组织一次公开的演讲。他强调“好学会”的合法性以欢迎文学志士聚集在一起研讨中国与外国的政治和科学的新理论，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是受中文教育的。三个主要演讲人是邱菽园、林文庆和叶季允，他们都是新加坡改良主义者的领袖。从 1899 年 9 月至 12 月的三个月中，他们第一批的十个讲演题目包括百日维新运动、儒家

学说、改革教育、设立孔庙和现代学校等议题。他们主要希望透过该会的合法地位，创造一种知识分子关注时事的氛围（颜清湟，2007：122-124）。

此外，林文庆亦曾当选为中央选区市政委员（Municipal Commissioner），据《海峡时报》的评论指出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应该是“经验较丰富、判断较成熟”（宋旺相著、叶书德译，1993：331），同时“具备广泛的政务知识”（宋旺相、叶书德译，1993：331）的华人社会代表，以协助“推行涉及庞大开支的改良计划”（宋旺相、叶书德译，1993：331）。林文庆表示“李俊源先生辞职后，我是经过多方踌躇考虑才接受提名的。现在我觉得我已经竭尽所能来完成这种繁重的任务了。”（宋旺相、叶书德译，1993：331）。林文庆在辞去这个职位前夕，曾向该委员会提出下列议案：“本委员会应从速给华人提供一片墓地，或者发给私人墓地许可证，但墓地仍须受到市政局管制。”当时私人墓地越来越少，而公共墓地则埋葬得拥挤不堪，坟冢累累，呈现一片混乱状态。一般受过教育的人，已经不再相信埋葬地点必须根据风水的指示，他们已不反对依照市政当局所实施的条例，把死者埋葬在基督教墓场了。林文庆是针对不久前提呈市政委员会的一项要求设立墓场的请愿书而提出上述议案。当时市政委员会已批准了这项请愿书，但却未付诸实施。经过林文庆的提呈，上述议案最后获得一致通过（宋旺相、叶书德译，1993：332-333）。

在卸任后，林文庆写信给陈若锦，以自己担任职务期间所面对时间上的问题，建议下一任中央选区市政委员应具备的条件。他说：“为了对今后要进行的工作着想，也为了对本地纳税人本身的利益着想，我希望你能够物色到一位比我更加有资格的候选人来取代我。当前市政当局所迫切需要的，是由商人慎重审查公共开支。这些人将会拨出一些时间来审查开支的细目。就我个人来说，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才能来担任这种职务而深感抱歉。”（宋旺相、叶书德译，1993：331）。

1914年10月5日，为了支持设立“威尔斯太子救济金”，各社会领袖齐集在纪念堂举行大会。总督阿瑟·杨格爵士（The Governor Sir Authur Young）宣布政府认捐一万英镑给“威尔斯太子救济金”，也请大家为本地捐赠一笔基金，使那些因战争而造成工商企业关门停业，倒闭而失业或陷于贫困危难的人们，将从这笔地方基金中得到救济。林文庆与余连城、陈谦福、林秉祥等华人侨领，获委任为鸠收捐款的总委员会代表之一（宋旺相、叶书德译，1993：420）。

1915年8月，当林文庆再度被委任为立法议员时，海峡华人体育会会长在特别为林文庆所设的庆贺宴会上致辞时表示“我认为，医生阁下无疑是议会中华人议席的最佳人选，华社可放心的委托这位富有经验的行家以保护他们至高无上的福利与权益。我这样说，相信你们都会欣然同意，而不至于认为是言过其实。这一任命表明，政府希望我们的贵宾能作为一位不负政府信任和愿望的议员，为政府提供卓

有成效、富有价值的工作和帮助。让我们对林文庆医生寄以厚望吧！以他同情老练，明察秋毫，深谙多种语言的有利条件，以他广识民情，对公众事务与具有的远见卓识，他一定会为英国在这一殖民地统治的利益尽心尽力，忠诚以报，因此，甚至于批评和诽谤他的人都一定会远在他任满之前，就乐于同他握手言欢”（宋旺相、叶书德译，1993：431）。

同时，林文庆也是当时在南洋少数能驰骋在东西方之间的社会精英分子。他在二十八岁那年荣获太平局绅的衔头。1902年，他到伦敦参加英王爱德华（King Edward）加冕典礼，是华人义勇军代表团员之一，他获颁英王爱德华加冕奖章。1911年，他又获颁英王乔治（King George）加冕奖章，并于1918年获颁英皇所赐的帝国四等勋章（OBE），50岁那年则获颁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林文庆组织、领导及参加了各重要的协会与公会。年仅二十七岁的他被安插在新加坡市政局和华人参事局，亦先后两次担任英籍海峡华人公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会长。在华人义勇军（Chinese Company of the Volunteer Force）成立时他即以身作则，入伍做个普通士兵，以便向富家子弟显示英国公民所应尽的义务。他在队伍里忠诚地服务了四年，退伍时，军阶为护旗中士（宋旺相、叶书德译，1993：199）。

1901年至1914年期间，林文庆由原本响应维新运动、维护光绪政权、接待康有为，改为支持孙中山，遂亲自参加了共和国的成立大典及担任孙总统的机要秘书和卫生部长。两人交情日深，故孙中山逝世后，林文庆一再写挽歌悼念，并刊登于《厦大周刊》，林文庆在此挽歌中称孙中山为“英雄”，赞誉他破除了束缚着人们的枷锁，并提醒人们要感恩他为了百姓的利益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林文庆，1929：10）。

除此之外，林文庆在1906年11月曾与同辅政司、警察总监、助理华民护卫司等在中华商务总会会所调解福建帮和潮州帮爆发了四天的严重暴乱。（严春宝，2012：55）1916年5月，他号召华社踊跃为“威尔士王子基金”捐款，成功筹足购买6架飞机的捐款，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军攻陷新马之前，呼吁人们支持英国的正义之战。

另一方面，林文庆以一位英籍侨生的身份，参加政治活动，在一些英人心目中是“持英国护照，而替中国的人民服务，是想要两面沾光”的小人。这些英人认为林文庆在殖民地上，参加结党行动，是不对的。面对一连串的责难，林文庆始终坚守自己的原则，在需要的时刻，为英国、南洋及中国的同胞尽一分力。

由此可见，林文庆身为医生，但却在这个大时代中，与新华社会、英国政权和中国政治文教，产生密切的关系，并在各项重要的政治活动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支持与回应。

第四节 诲人不倦的一代导师

教育，丰富了林文庆的知识，开拓了他的视野，亦赋予了他使命感，使他毕业后成为耀眼的社会精英。良好的教育基础为林文庆的锦绣前程铺路，让他得以逐一实现理想与抱负。因此，林文庆一生致力于教育。

林文庆办教育的热诚，也许和他自小获得多位良师的关怀及栽培有关。其中包括了莱佛士学院的胡列特校长，以及留英期间的数位教授。1888年，2月莱佛士学院举行常年颁奖礼时，胡列特校长说：“我十分相信文庆本人会出人头地的，因为我看过许多学生离开学校，走进社会，而在毕业离去的学生当中，没有一个前途比我对他怀着更大的信心。”（宋旺相著、叶书德译，1993：198）。这些有学识涵养的知识分子，指导他为学和做人的道理，使他深刻地感受到优秀老师对学生的悉心栽培与默默付出，将给学生带来极大的影响。

1893年，24岁的林文庆学成回返新加坡后，“一心一意要在本殖民地华人当中进行一切道德、社会和教育改革。”（宋旺相著、叶书德译，1993：198）。在检讨海峡殖民地华族教育时，林文庆发现当时英校教育内容“只是一些例常的简单公式及背诵工作，当中没有适当的灌输爱国心、孝心、美德和智慧。”眼见海峡华人社会的腐化，怀抱忧患意识的他对眼前一切有更敏锐地观察，他自觉有更强的使命感去推行改革运动，认为透过教育去提升民族的道德价值观，更是刻不容缓的。林文庆还创设了华人好学会（The Chinese Philomatic Society），这个组织数年来积极展开会务活动，集合了一些青年人和若干老前辈，定期研究英国文学，西欧音乐和中国语文（宋旺相著、叶书德译，1993：199）。

林文庆其中一个对社会的贡献是他大力推动女学运动。他在〈海峡华人改革之三——子女的教育〉一文中，以民族的前途为出发点，忠告华人：“女子没受教育，就等于她们所属的那个民族，有一半人数是处于无知和退化的状态，必然不会有很大的进步。”（Lim, B.K., 1899: 102）。由此可见，逐步发展女学教育是林文庆当时办教育的重要理念。后来，他与宋旺相及邱菽园等人创办了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

此外，林文庆推动女学的运动亦深深的影响其身边的友人，如殷雪村（1877-1958）、潘清香（1850-1912）等人。“开明的潮州商人”（宋旺相著、叶书德译，1993：377）潘清香在他五十岁那年，遵照医生的劝告，参加了“华人骑马会”（Chinese Riding Party），结识了这会的主要会员，如：林文庆、陈武烈（1874-1934）等人。林文庆“成功的劝使他成为非常热心于华人女子教育的人”（宋旺相著、叶书德译，1993：379）。他“不屈不挠的努力，得到许多商界友好的同情支持，第一间中华女子学校（Chinese Chung Hua Girl's School）于三月卅日在登路（Tank Road）门牌一号开办了，这个校舍属清香先生所有，让学校使用，不收租金。其主要目的是要在新加坡的妇女和少女中传播华文的知识。”（宋旺相著、叶书德译，1993：377）在中华女子学校（Cheong Hua Girls' School）成立之后，他极力协助该校校务之发展，直到他身体有病才把校务搁置一边。他逝世时，全校的学生都去参加了他的葬礼，以示崇敬（宋旺相著、叶书德译，1993：379）。另一方面，该校的管理是由王邦杰、薛中华和殷雪村医生所组成强而有影响力的理事会负责的。女校长是殷爱丽丝小姐（Miss Alice Yin），即殷医生的侄女（宋旺相著、叶书德译，1993：378）。这几位推动女学的社会领袖都是与林文庆要好的友人。

另一方面，林文庆于 1899 年开始推动海峡华人学习母语。在当时，海峡华人对华文教育或对中国文化所知甚少，而他们所受的英文教育，即使是长达十三年之久，也还是肤浅的。林文庆认为，“教育并不是让一位男孩懂得背诵上百句的弥尔

顿（John Milton）或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诗句即可”（Lim, B.K., 1897: 54），而且他发现“学生对于自己所学习的课程没有热忱或激情。”（Lim, B.K., 1897: 54）。只有极少数的优秀学生，因受过良好的英文教育，才能深入而获得西方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来代替所丧失的中国文化。可惜大多数的人民对肤浅的英文教育感到满足，因为职业上他们获得保障，生活上得到享受。对此，林文庆认为马来半岛的教育向来控制在不同的统治者手里，所以华人的教育未能受到适当的照顾。

林文庆不能容忍峇峇们那种追求西方生活，对于中华文化却极为轻蔑的态度。重视中华语言的他提出了“我们应该训练孩子学习两种语文，这是基于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我们种族的生存。”（Lim, B.K., 1897: 55）。林文庆多次强调海峡华人是汉族的子孙，他在〈海峡华人的伦理教育〉提及“我们是伟大中国的后裔”（Lim, B.K., 1904: 25），并将汉语称为“母语”（Lim, B.K., 1898c: 167）。因此，他曾在自己的寓所组织华语传习班，以新颖教学法教导华文，还用厦语拼写、解释和翻译《左传》的一些篇章，作为教材。

另外，在中国领事馆的协助下，他组织华语夜班，分开两组在华人体育协会和中国领事馆上课，总领事还举行鉴定考试，颁发奖状和证书。在他的影响下，新加坡的一些学校也增设华语课程，而檳城和爪哇也开始重视华语的学习（李元瑾，

1999: 84)。他的爱妻黄端琼也曾在他所创办的新加坡华人女校负责教导华文。林文庆呼吁人们重视华语，因为“峇峇身为世界上最有文学修养的民族之后裔，绝不应让祖先这美妙的语言在他们之间消失。每一位不谙华语的海峡华人都应该觉得惭愧。”（Lim, B.K., 1901a: 18），并举例说“每一位受教育的欧洲人在学校都读拉丁语，我们完全没有理由让华人子弟在学习英语的同时，却不能教授他们学习华语。”（Lim, B.K., 1901a: 18）。

林文庆在 1921 年应陈嘉庚之邀，前往厦大担任校长一职。当时的他在南洋是一位风云人物，但他却欣然答应陈嘉庚，为中国教育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不难发现，林文庆愿意肩负厦门大学校长一职，和早年他勉励峇峇应主动关心中国发展，并“向前迈步及继承属于汉族子孙的文化遗产”（Lim, B.K., 1903: 100）的思想是一致的。

向来注重中华语言的林文庆，在厦门大学时亦提出大学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研究，“凡属文言、白话、词章、考据、历史、哲学、伦理及文学之改革、语音之变迁，均莫不深为研究”，以“发扬本国固有之文化”（林文庆，1928: 2）为宗旨。在国学研究院成立大会上，林文庆强调国学和西学两者不可偏废，指出承传中国数千年来的固有文字是为了承传中国的灿烂文化，统一中国各省的方言是为了

防止将来的四分五裂。林文庆在厦大亦积极强调本校各科之教授，除有时采用英文教授外，其余皆用国语教授。凡各种土音，在教课时均完全摒绝不用。

若林文庆当时在南洋倡办女学及改革海峡华人的教育是如鱼得水的，抑或他在厦大担任校长期间是一帆风顺的，那么我们将难以见证林文庆坚守在其教育岗位上的魄力与决心。恰恰是社会的种种反弹、漠视与讥讽，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林文庆具有卓越的远见及其独特办教育的理念。这和他肯定儒家思想具有教化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其教育的宗旨在于为民族、为国家、为天下培育“君子”。

第四章 林文庆的儒家思想研究

林文庆在南洋不仅仅是一位留学海外的高知识分子或能言善道的社会精英，因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对儒家思想的学习与认识，也在在的影响了他的为人与志向。此外，儒家思想也成为他跨越族群、地域和语言藩篱，在不同领域做出贡献的核心价值。

生长于峇峇家庭的林文庆，自小接受英式教育，最终却选择回归东方汲取养分，宣扬儒家思想，作为他社会改革的核心思想，这和他个人幼年的教育和留学英国的经验大有关系。如第一章我们所提到的，林文庆出生于海峡华人家庭，因父母早逝而在祖父的养育下长大。祖父林玛彭（生卒年不详）于 1839 年从中国移居槟榔屿，是位文人。林文庆虽然生长在一个峇峇的家庭，但也是一个“中国化的峇峇家庭”。林文庆的启蒙教育就是祖父的身教言教，及曾在福建会馆学习四书五经的短期教育（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编委会，2007：21）。他虽然在莱佛士书院接受英文教育，然而，幼年一点中文教育的基础与熏陶，已为林文庆往后返归儒学奠下因缘。

林文庆被誉为语文天才，通晓华族几种方言、马来语、淡米尔语、日语、法语、德语和希腊语等。然而，有一回，当身在英国的他在中国同学面前不谙华语，

不能为讲师翻译中文习卷时，内心大受刺激。这时，他意识到民族的自尊自信是建立在自己的文化上的。于是，他立志掌握中华语言与文化。留学英国时期的文化冲击，以及和香港、中国学生的接触，激发了林文庆的自我意识，并开启了其寻根的旅程。此外，留学回国后的林文庆，身边亦多了一些掌握中华文化的亲友。他的岳父黄乃裳（1849-1924）是由中国南来的的基督徒，国学造诣极佳，曾经中过举人，而爱妻黄端琼（1873-1906）、好友邱菽园（1874-1941）、陈嘉庚（1874-1961）、陈楚楠（1884-1971）等人都对其在认识中华文化，包括儒学方面有着一定的影响。

十九世纪末，南洋的改革运动轰轰烈烈，深得知识分子的鼎力支持。林文庆是当中的中坚分子，而儒学运动亦是改革运动的一环。林文庆对儒学的肯定，也可见于他一再强调西方的民主政治早见于儒家孟子的民贵学说（Lim, B.K., 1915: 93）。身为儒学运动的先锋，林文庆的儒家思想展现在各类的课题，包括教育改革（Lim, B.K., 1915: 93）、伦理教育（Lim, B.K., 1904a: 29）、学校课程、母语教育（Lim, B.K., 1897: 55）、女学教育（Lim, B.K., 1904b: 206-207）、引进科学与医学（Lim, B.K., 1898b: 90-91）、报业、尊儒教（Lim, B.K., 1904a: 27）、政治观、反鸦片（Lim, B.K., 1906: 150）、去辫子（Lim, B.K., 1899b: 24-25）、反缠足、改衣着（Lim, B.K., 1899c: 57-59）等。

要理解林文庆的儒家思想，还必须充分认识他毕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育之路。林文庆如此不懈于教育事业，在于他认为儒学最核心和根本的精神是“教育”，尤其是德育方面。放眼世界各地，包括当时的中国教育却将儒学传统及中国文化精神抛弃了，林文庆期望能以自己的教育思想及言传身教来重塑孔学的真精神，并延续传统教育的命脉，这不仅为国家栽培人才、精英，更为社会培育出“君子”。

林文庆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并综合现代新思想，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他身在南洋与中国期间，先后在华族色彩日趋褪色的海峡华人社群播下儒学的种子；于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中在厦门大学默默栽种儒学的幼苗。在这两个时期，他分别在两地肩负宣扬及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当代生命价值的使命。林文庆亦是一位教育家，立志以教育弘扬传统文化。他从西学回到中学，希望以儒家学说改造海峡华人社会的道德观和内涵（Lim, B.K., 1910: 165），这种信念直至他身在厦门亦没有动摇。因此，他在南洋及厦门大学积极办教育和提倡儒学运动是有其特殊意义的。

1914年，林文庆出版了一本名为《民国必要孔教大纲》的著述，当时的印刷者为上海虹口东百老汇路的中华书局，书的封面注明此书的著者与发行者是林文庆，定银五角。过去，学者们在研究及探析林文庆的儒家思想，主要是从他在报章上发表过的英文单篇文章、演辞、书信等认识其儒家思想。当中亦有专家、学者在

进行资料收集的当儿，提及林文庆的《民国必要孔教大纲》可能已经遗失（李元瑾，1991：236），无从考究。后来，每每与林文庆相关的论文或单篇文章，几乎都不外如此叙述，表示《民国必要孔教大纲》已失传。然而，事实上，此书并未遗失，而它正是研究林文庆儒家思想不可或缺的珍贵材料。唯有从《民国必要孔教大纲》这一本著书，我们方可更加清晰地、进一步的理解林文庆的儒家思想。此书的目录列明了其内容涵盖了〈儒道序略〉、〈孔子序略〉、〈孔门弟子及后儒〉、〈经学考〉、〈儒学考〉、〈儒学类〉、〈道体总论〉、〈道〉、〈事上帝〉、〈理〉、〈天命〉、〈性〉、〈志〉、〈生死〉、〈存养克治〉、〈孝〉、〈悌〉、〈仁〉、〈义〉、〈礼〉、〈信〉、〈毅〉、〈政体〉、〈儒教之共和民资格〉、〈民国大宗旨〉、〈欧洲政治大概〉、〈议院〉、〈乱〉、〈教学大宗旨〉、〈武备〉、〈妇女〉、〈妇女之性〉、〈儒之贤女〉、〈辨异端〉、〈中华民国必不能离乎儒〉。透过以上的目录，我们不仅得以从中窥探林文庆在编著此书时的思路，更进一步见识了这位“峇峇”具有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底蕴。

本章，笔者主要将从林文庆遗下的《民国必要孔教大纲》、中英文著作、单篇文章及演辞，进一步分析与论证林文庆对“孔教”、“教育”及“女学”的理念与推行，并侧重论述林文庆“培育君子”的儒家思想。

第一节 孔教的诠释与信仰

林文庆在《民国必要孔教大纲》中写了一篇名为〈志〉的文章，当中提到“志者，心之所向也。其理自脑而动，在人性中最重之一。”（林文庆，1914：65）。他认为“志”是人性之中最重要，最应被重视的一环。“有志而后得以自由，不为气所束缚。试深思之，必有志，方有我有真觉有人己。”（林文庆，1914：65）。反之，一个人一生中若没有立志，他将如“只一枯木之漂流，随风逐浪而已。”（林文庆，1914：65）。那么，究竟为何林文庆要立志习儒呢？

1888年，远赴英国深造的林文庆，自然注意到当时的英国上下对中国事物充满兴趣，而他亦开始留意到中国的受辱遭遇和自救历程。中国能否自救影响到中国自身的前途，而中国的前途不仅影响到中国人的地位，更会影响到海外华人的地位。身为海峡华人的林文庆一向自豪于自己身为英国大帝子民的身份，但身在英国期间，却深刻的体会到在英国人的眼里，自己确实并非英国人。而面对留学英国的中国学生，虽同样是黄皮肤黑头发，却因语言障碍而始终无法与他们交心。林文庆此时对于“我是谁？”有着深刻的疑问和感受，因而开启了他寻找自我身份认同的旅程。明明身处西式教育的洪流之中，殊不知，远赴英国这片土地留学，竟然是林文庆与中华文化奇遇的契机。

林文庆学成回新后，便开始对群众宣扬儒家思想。究竟林文庆如何看待孔子？如何定义孔教呢？对此，林文庆在《民国必要孔教大纲》中的〈毅〉提到“此理何以谓之儒？谓之孔教？曰：名者无关。如西教亦多名称，如行德社、道德会、一体教种种。夫我国人称教为孔教者，实以孔子所保存之古经书，下其种子，而谓之孔教耳。”（林文庆，1914：98）。孔子传下的学说究竟应称之为儒家学说，抑或是孔教？林文庆明确的表示，称之为孔教是因为孔子不仅保存了“道”，还致力将“道”传给世人。林文庆提及孔子“所教导的就是古代圣王留传下来的传统宗教哲学。此曾被称为人道教（Religion of Humanity），儒道（Ju Tao），普遍上以儒教（Confucianism）见之于欧美。儒字来自人（Man）和需（Necessary），字意即‘人性所需要的’（Whatever is essential to human nature）”。（Lim, B.K., 1931: 2）孔子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为“中国首出之一人也”（林文庆，1914：98），功绩盖世。因此林文庆认为将儒家学说称为孔教是“吾学重此以为本，则以之为名，以表吾宗旨也”（林文庆，1914：98-99），因而他坚持把儒家思想称为“孔教”。

其次，面对其他专家学者提出：儒家学说并非专属孔子一人的思想学说，继孔子之后，仍有许多杰出大家的出现，所以将儒家学说称为孔教并不恰当。对此，林文庆的解释是“夫教之圣贤，亦甚多矣。虽他教亦然，如景教则保罗之功甚大，其后则传道之著望者亦多，以名之一小理，而表其大，此举世皆然。”（林文庆，1914：99）。纵使孔子出色的门第、后学众多，但从人文历史的脉络来看，孔

子的地位可说是独一无二的。林文庆进一步以荔枝作为比喻。“如荔枝者，一果之微耳，而以表见其树之根株枝叶者无数，而一言荔枝，遂各呈其象而明之焉。”

（林文庆，1914：99）。闻“孔教”二字，即见历代以来儒家传统学说的源源流传。

长期以来，专家、学者们对于林文庆所提倡的儒教或孔教是否属于一种宗教，皆持有各种的看法。对此，其实林文庆本身有着非常鲜明的立场：“如果你把宗教解释为某种信仰，在这种信仰里，人们宣称他们对于超自然之物或人的信念，那么儒教就不是一种宗教。但是，如果宗教意味着一项规范，指定人类的责任和义务，那么儒教是一种最高级的宗教。”（Lim, B.K., 1909: 48）。由此可见，林文庆重视的是宗教的教化功能，而不是具有迷信色彩的信仰或崇拜。

林文庆进一步在《民国必要孔教大纲》中提到“则我东方人，多认中华圣人为我圣人，何敢谓他国圣人皆非真也。佛则印度圣人，耶稣则今日西欧圣人。此为确然者，盖各国圣人者，引出其野蛮以入乎文明也，引出其黑暗以入乎光明也。”

（林文庆，1914：48）。至于为中国启迪文明的人，则非孔子莫属。“我国之文明者，已六千年，而所以存此文明者孔子也。盖前圣人之道，孔子保存之也。我国人须以引吾祖宗入文明者为我圣人。何至竟以他国圣人，而自背我圣人，自坐以野蛮无教也。虽然，非谓外教之来，则必拒之也。各教之人，尽可交亲。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惟必究乎我本有之教，使吾民尽明孔子之道，味其教化之美，探其理义之深，使自男女老幼，沾我古圣启迪之厚。”（林文庆，1914：48-49）。此

外，林文庆不排斥进一步了解及检视其他的宗教信仰，“今日我国论道，不得不多少研究于天主耶稣之二教。其教分数十门，而同是崇奉耶稣为教主，迷信许多鬼神异事。”（林文庆，1914：140）。他本身对于孔教的信念，正是来自于他多年来对其他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认识。

关于西教的弊端，“兹特举其尤者言之。一、其新书二约书，为上帝所默示者。然欧洲格致家，深考此事，书中自相矛盾者甚多，而事又多与正史不符合，所言上帝鬼神情事，皆野人世代时景，于正理不合。故欧洲人，无论教中教外，于默示一说，逆而不信。二、其言人之得罪上帝，而生耶稣于处女之身，为人钉死而复生，以升天堂。其信之者，死得复生，服毒不死，握蛇无伤，由移山倒海之能，借无稽之类，可以辟佛之迷信以对付之足矣。三、其兼爱之道，第与成仁同义，而不见其能实行。四、祈祷有力之法，考欧洲历史，其自古及今，恶事无殊东方。可知其教以近二千年，未必有上帝之助之也。”（林文庆，1914：140-141）。纵观以上四点，我们不难发现，有别于当时一般捍卫儒家思想的传统文人、学者，林文庆由于其成长、留学、社交的背景，他对于西教与西方文明有着深层的掌握和理解，而林文庆对孔子学说的认识，也使他确立了儒家思想为其终身的信念。

林文庆时常将儒教和其他宗教加以比较，特别是基督教，以此证明儒家思想是最适合华人的宗教。“林文庆在 1895 年发表论文《宗教在中国的影响力》，赞扬儒教，批评基督教，引起当地传教士的不满。从 1895 年到 1910 年之间，双方展开一场长达十六年的儒教与基督教的辩论。”（李元瑾，2001：171-190）。林文

庆对基督教的认识始于他的英文教育背景。胡列特校长在他赴英深造前就对他

说：“我劝你带着一本圣经在身边，什么时候有空就阅读，圣经是英文的基础。”（李元瑾，2001（a）：266）。再者，胡列特校长、巴伯教授（Dr. A. H. S. Barbours）、他的两任妻子及数位好友如宋旺相、林观泰（1866-1921）等人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林文庆终身难忘师长们的栽培，再看他择偶的抉择及一些与他并肩作战、进行改革运动的海峡华人领袖的宗教信仰，我们由此肯定林文庆对于西教并没有排斥或憎恨之心。对此，林文庆表示“故吾儒之对于他教，无所固执，且不异待之，惟求其理。果合，不论其何自来，有为我所不足者，必取以为补助。至于无稽之事，自不得信之。如其善也，必不因其由彼出。”（林文庆，1914：141）。林文庆不耻西教传教士、学者等为了宣扬西教，而歪曲儒家学说。因此，除了为孔教做出详细的解释与澄清之外，他进而严厉批判西教不符合科学及实践性的内容，否定西教的种种迷信。一如林文庆曾在文章表示“吾儒之心，如审判司。所疑必问，合乎仁义，无不赞成之。”（林文庆，1914：141-142）。

而引起林文庆与西教人士打笔战的祸根是起源于美一美学校。“奥德汉牧师和该学校初期的华人赞助者之间所订立的合约或谅解，订明传授给华人儿童的教育必须是属于纯粹非宗教性质的。”然而，“学校当局违反奥德汉牧师向富裕华人支持者所作的保证，不在日校或寄宿学校中推行宗教教育。”于是，争议由此开始。

“1896年7月25日有读者以‘以赛亚’（Isaiah）的笔名投函本地报纸，吸引了政府和华人大众注意到美一美学校校长凯尔索牧师（Rev. C. Kelso），向美国教会所作

的报告，说他对进入该学校读书的学生进行改宗的工作取得很大成功。”（宋旺相、叶书德译，1993：242）。匿名信攻击学校当局强迫学生成为基督教徒，结果造成多位学校信托机构的华人委员辞去了信托员的职务。同时，也使得大约一百名学生的父母将他们的孩子转往其他学校就读。这场轩然大波持续了数日，一直到校长出面保证：尽管学校属于教会主办，学校的老师也是基督徒，但学生从来就不曾被强迫皈依基督教，事情才算告一段落。有学者提出，‘以赛亚’极有可能是林文庆（李元瑾，2001（a）：267）。如此一来，他和基督徒之间的矛盾即公开化了。姑且不论写匿名信的是否是林文庆，然而这件事情的发生，显示了海峡华人社群当中有人因无法容忍学校以各种方式强迫学生皈依基督教的做法，而将之公诸报端，揭露出问题。这起事件引起极大的回响，造成学生退学、数位该校华人校董愤而辞职。这反映了海峡华人虽然受英文教育，同时亦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但普遍上对基督教相当抗拒，这在在证实了林文庆宣扬孔教的需要及可行性。

除此之外，林文庆曾在一篇文章里引经据典，用实例来支持“西学源出中学”的说法。文章提到“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的进化论是一种很古老的哲学思想，早见于中国古代之史籍和经典，中国历史哲学家认为历史盛衰和国家兴亡的现象，可从《易经》所阐明的自然法中获得解释。‘易’字即西方‘演化’的同义词，《易经》就可译成 *The Book of Evolution (Change)*。”（Lim, B.K., 1915: 93）。另外，西方的民主政制早见于中国儒学，孟子早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说法（Lim, B.K., 1915: 95），而儒家已证实土地国有化、交通工具、公

共事业等等的重要性（Lim, B.K., 1915: 97）。儒学提倡国家之间合谐，以确保世界和平，而今日德国发动战争造成严重灾害的事实，足以证明儒家思想主张的实用。所以，“欧洲现在所思所想的，中国两千年前已传授给学生们。”（Lim, B.K., 1915: 98）。

林文庆在〈宗教在中国的影响〉中泛论在中国的儒教、道教、佛教、回教和基督教，其中谈论得最多的是关于儒教，包括孔子对鬼神、上天、人性、祖先祭祀和中庸之道等的见解。当中也提到孔子重视理性，要求人们自我反省以洁净内心。此外，他还在文中反驳西方传教士之孔教无希望的说法，斥之为偏见与幻想（Lim, B.K., 1895: 60-64）。“而吾儒者，何以不能以文明而传我六千年之教乎？外人多讥我国之风俗宗教者，致其国人轻视而侮辱我也。”（林文庆，1914：42-43）。面对西方传教士、学者来势汹汹的质疑与攻击，林文庆保持着的态度是“然则我今日以夫子之道为念，正不必怒之，不必愤之。惟是详察其言，如其是也，则反己而自改。如其非也，其自误耳。吾儒于今日，则不得不讨论其教，以救吾民勿使深入迷信也。”（林文庆，1914：43）。

在〈中国的革新〉一文中，他驳斥一些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所作的误评，指出中国的保守主义非根源于孔子的教义，从这点来解释中国的衰弱是错误的（Lim, B.K., 1898b: 90）。林文庆并不否认基督教“有实行教诲于人，勉以仁心，亦著有功效。”（林文庆，1914：141）。对于基督教进行一些“如慈善济人，设义学病院，冒险以传其道于天下，显其仁心，有可称焉。”（林文庆，1914：141）。但

是，若以儒教和基督教相较之，他认为基督教应“舍弃不合之迷信”（林文庆，1914：141），并表示“望我国人，已受其惑者，可取天理为火，以试其真伪，得其善而去其弊可矣。”（林文庆，1914：141）。

身处“日月无光，浮云自蔽，晴天减色”（林文庆，1914：1）推翻、抨击儒家学说的时代，林文庆不讳言，儒者应负起最大的责任“吾不得不责之儒者矣。尝谓儒道之衰，不在于不尊崇之，而在于尊崇之失当。”（林文庆，1914：1）。我们由此可以进一步厘清林文庆对习儒的定义。“是故拘泥之士，视经书为咒诵，礼圣贤若仙佛，切于身心者，茫如也。是故斤驰之士，苦名教之束缚，目圣贤为迂腐，关乎实学者，漠如也。是故曲学之士，鄙经书为不新，斥圣贤以专制，纯为至理者，懵如也。”（林文庆，1914：1）。对林文庆而言，盲目的膜拜经书或圣贤，视孔教是束缚、迂腐或专制的人，皆陷入了他以上所提到的“茫如也、漠如也、懵如也”的窘境，如此下去，只会离“道”愈来愈远，却不自知。

有人质疑孔教虽旨为引人向善，但却是知易行难，“人有谓孔子之道虽善，惟使人知所谓，而不能使人之有力于行也。”（林文庆，1914：96）。不仅一般普罗大众难以实践其教义，更批判儒家学说仅对上等人宣扬，“儒道仅以语上等人耳。”（林文庆，1914：96）。林文庆认为这种言论“此皆野蛮专制之居心，非明儒理者也。”（林文庆，1914：96）。并解释“儒者一贯之理以传道，虽万物无不各得其宜。何中等下等人之有不合。”（林文庆，1914：96）。这力证儒家思想适用于各阶层人士，更没有高低的阶级之分。

眼见中国处于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中，林文庆深深感慨“古者化形及四远，今则异方之俗，入我内地，外道以教吾民。儒者对此，能不心伤。”（林文庆，1914：49）。纵使他知道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身为海峡华人的他仍远赴厦门，肩负宣扬孔教的重任，他说：“是故我而不背圣人之道，必于吾道与德，有足破远来之迷信，使已受迷者自归，使传其道者，受吾感化，得吾奥理，悦吾礼义。”（林文庆，1914：49）。我们由此可以得知，林文庆一经立志习儒，即怀抱“而传吾万古不磨之文明以去”（林文庆，1914：49）的使命，期望儒家学说的“道”可使国家振作、富强起来，不再受他国欺压“而我中国复收我应有资格，皆吾党所当深念者。”（林文庆，1914：49）。

林文庆一生完成了不少有关儒学的文章，他认为“儒教乃综合政治、伦理和宗教之一种自然体系，根据种族和个人的政治与社会经验，推断个人与宇宙、全人类和家庭的个别关系”（Lim, B.K., 1909: 40）。他在许多作品当中都谈到孔子的知之谓之。他指出“孔子，一位不可知论者（agnostic），对于他不知道的事物不表任何意见。他力劝学生在奉行祭祀时必须真诚”（Lim, B.K., 1931: 6），并表示孔子“本着真和诚，并清楚的制定了不可知论的最高原则。该原则在他两千五百年之后，赫胥黎教授宣布为科学的信条。孔子这样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Lim, B.K., 1931: 6）。林文庆对于孔子认识事物的态度，给予极大的肯定。

林文庆在《民国必要孔教大纲》中以〈中华民国必不能离乎儒〉作为全书强而有力的总结。文中提到儒家思想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重大影响：“则儒道为甚合乎中华之国民性质也。不论属于何部学问政事风俗无一不得以儒礼而变通之。”

（林文庆，1914：142）。而林文庆极力批评近代以来学术界崇尚西方，肆意批判中国学术传统的风气。对此，他提到“不得儒理而取外国之美善以来，且不能用之。以儒理为本，然后能用万国之美，以化成吾美，而吾民亦足感动以收之。”

（林文庆，1914：142）。我们由此可见林文庆这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

对个人而言，林文庆希望国人秉承儒学经国济世的精神，为解救日趋深重的民族危机尽绵薄之力。他提到“况外国高明之士，极望我国人，谨守圣人之道，不为新酒所醉，以古昔宝物，而自轻弃之也。须知儒学之能维持一概事务者，盖六千年矣。儒理之于言语文字思想性情风俗及英雄思想，凡属美善，无不与相维系。如谓今日以舍弃儒道，则几如以我数千年教化而毁之。如此，则在万国之中，为一小稚子。”（林文庆，1914：142）。林文庆很能够将孔子的为政思想反映出来。

《论语》中有提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宋]朱熹，1983：91），又谓君子当“脩己以安百姓”（[宋]朱熹，1983：159），以此言明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之大理想。林文庆此番言论不仅体现了对中国未来命运的深切关怀，也表现出对世局的深思卓见。

第二节 培育“君子”的教育理念

孔子重视“学”。《论语》首篇为〈学而〉篇，开宗明义已言“学而时习之”。孔子本身即是一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典范。孔子好学与为学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民族重视教育、看重学习的精神。因此，《民国必要孔教大纲》中〈教学大宗旨〉提到“行儒道之教，学为大根本。此人人知之也。学之方，亦极多矣。盖与行政同，而为行政首要。欲知人，则以学观之，而美恶自辨。”（林文庆，1914：125）。

林文庆因为接受良好的教育，前途一片光明。这亦赋予了他使命感，使他毕业后成为耀眼的社会精英。林文庆在莱佛士学院求学与胡列特校长的相遇，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点。胡列特校长不仅在空闲时在自己家里为林文庆补习，还与他分享自己的藏书。当林文庆的祖父母要其停学时，胡列特校长即托人帮忙劝说林文庆的祖父母让他完成学业，才使林文庆不至于停学。在胡列特校长的激励下，最终获得英女皇奖学金到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攻读医科。此外，林文庆在留英期间，好几位教授都对他关爱有加，如他的奖学金捐助人之一莫特教授（Prof.Mott）、巴伯博士（Dr.A.H.S.Barbours）、剑桥大学病理学系主任罗依教授（Prof.Roy）等。（宋旺相，1993：235、339、340）这些有学识涵养的教授与老师对他的一生有着极深的影响。1893年3月20日，《叻报》刊登林文庆光荣返回新加坡的新闻。身怀成就的林文庆，一直深深的感念恩师们的栽培与辅助。

林文庆的好友宋旺相（1871-1941）在《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当中提到，林文庆办教育的热诚，也许和他自小获得多位良师的关怀及栽培有关。其中包括了莱佛士学院的胡列特校长，以及留英期间的数位教授（宋旺相，1993：235、339、340）。1906年9月廿七日，曾担任莱佛士院校长及民众辅导主任（Director of Public Instruction）的胡列特校长要离开南洋前夕，莱佛士学院的校友们募集了一千二百九十元的款项，设立“胡列特奖学金”（Hullet Scholarship）来纪念他。如此一来，往后每年有一个莱佛士学院的学生，获得六十元奖学金。作为主席的林文庆在致辞中表示他深深感激这位“用严格和坚定的态度来教育学生，同时又对一些学生表示了他的仁慈心”的校长对他的恩情，承蒙校长的帮助，想方设法使他能够获得女皇奖学金，使他在今日得以谋生（宋旺相，1993：280）。林文庆然后把一枚金表连同金表链赠送给胡列特先生，作为他以前的学生送给他个人使用的纪念品。此外，林文庆也请求莱佛士学院的代理校长菲立普斯先生接受一张胡列特先生的放大照片，以便悬挂在学院中（宋旺相，1993：281）。像胡列特校长等这些有学识涵养的知识分子，指导他为学和做人的道理，使他深刻地感受到优秀老师对学生的悉心栽培与默默付出，将给学生带来极大的影响。这促使林文庆往后成为了教育家，并在南洋、中国不遗余力地推动女子教育、伦理教育、医学学术、华文教育等各领域的教育工作，从而回馈社会、报答恩师。

除此之外，儒家思想是林文庆在不同领域做出贡献的核心价值。他特别重视儒家思想中的教化功能。他说：“儒学所包括者，圣人传下之教，如修身政体史学

物理格致皆是，分以五类：一曰道体，亦称曰教所谓宗教也，如释教耶稣教之谓。二曰理学，即今日哲学之谓，兼格致说。三曰存养克己，今日修身之谓。四曰治体，兼道家言。五曰教学，今日所谓教育之大纲。”（林文庆，1914：45-46）。

林文庆在《民国必要孔教大纲》还提到“故学之宗旨，虽在和人性，亦必渐以高远。不然，人亦何所希望，则学而空究其理，亦不得也。须知历代我国，由来风俗社会之习惯，而讲求之，以益公私。盖必私之益合于公，此正儒教之教也。使人之己益者，不损其一家之益。而一家之益，不害于一国。此一国不害于彼一国。盖君子立学之大宗旨也。首在教人以为人，其道在孝弟，以行仁于国。”（林文庆，1914：126-127）。

年轻时曾远赴爱丁堡大学升学，并亲睹西方之繁华的林文庆提到“文庆虽未尝学问，惟久于深接外国，且数年留学欧洲，深为西国之教所激动。知欧美日本之强，实由其人之存道德，故其格致学之进步外，则其人人之各有为人资格也。”

（林文庆，1914：2），并进一步以自己的经验劝导人们不要一味的崇拜西方国家，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孟学说毫不研究。这恰恰是林文庆与众不同之处。相较他在南洋海峡华人的知识分子群，如与他同样毕业于英校，并享有社会地位的宋旺相、伍连德（1879-1960）、李俊源、林秉祥、林义顺等人，我们不难发现，林文庆可说是唯一明显转向儒学，并且有兴趣学习、研究与大力推动的一位。他积极关注海峡华人的教育问题，认为必须从伦理教育着手，并凝聚当时的社会精英，尽力改善及提升海峡华人的道德意识。因此，教育“首则教以保身。既知保身，便

知保家，而即此爱理，以保一族一国以及人类也。以理导之，以切近之道，省其迷信之功力时刻，而以之为实学有用功夫，则人群岂不大加进步哉？”（林文庆，1914：97）。正是因为他丰富的历练、对儒学的信念及推动教育的魄力，让他后来成为陈嘉庚心目中厦门大学校长的最佳人选。

24岁的林文庆于1893年学成回返新加坡后，并不仅仅把目光狭隘的锁定在海峡殖民地教育使海峡华人能受雇于海峡殖民政府，生活安定无忧。在〈海峡华人的享乐主义〉中，他批判了海峡华人放纵物欲、只顾享乐的现况（Lim, B.K., 1900a: 108-111）。因此，林文庆积极关注海峡华人的教育问题，认为必须从伦理教育着手，改善及提升海峡华人的道德意识。林文庆曾表示“教育令人思考如何把个人的利益和家庭的利益相结合。教育可以在家庭和国家之间建立一座桥梁，在孝道上建立起爱国主义。最后，通过教育，人们认识到凭借正义和仁慈达致全人类团结的重要”，并认为“真正的文明由此扩展”。由此可见，林文庆心目中理想的教育，不仅仅是停留在知识层面，更是与个人道德的灌输及培育无法切割的。

由于家庭教育缺少一种宗教生活和道德训练，这让他意识到，当时的海峡华人迫切需要一种宗教和道德文化。他道出：“回教徒读可兰经，基督教人士传授圣经，只有海峡华人的子弟是在没有道德训练的环境中成长。”（Lim, B.K., 1899d: 105）。林文庆在〈海峡华人的伦理教育〉中，就把儒教跟基督教、回教、佛教和道教作一番介绍和比较，以进一步证明儒教是最适合海峡华人的，同时劝勉他们为家人提供这伟大的伦理教育（Lim, B.K., 1904a: 27-30）。对于宗教的定义，诚如之

前所提及的，林文庆认为“如果宗教的意义是在于教化与规范人类的职务与义务，那儒学将是最高尚的宗教。”（Lim, B.K., 1904a: 29）。他强调儒家思想不鼓励迷信鬼神之说，而儒家思想对“天”（Heaven）的诠释，亦有别于基督教或回教中万能的“神”。儒家思想中“敬天”的概念，是无需牺牲、祷告或神父，而是透过“敬天”（Worship to Heaven）让一个人觉察至高理想的心性与人道发展。因此，“敬天”不是指向我们看不见的“神灵”祷告，而是修习“礼”（Li）与人道，旨在为人类创造美好及幸福（Lim, B.K., 1900b: 26）。

在检讨海峡殖民地华族教育时，林文庆发现当时教育内容相当贫乏。他认为“此小学之事，在为人资格已明。则有中学，以学治生知识，得普通之才。有作事应机之能以自立，而不必恃人，自能开智以尽专门之学。盖中学者，为开其智力，以入实学之门者也。其宗旨在能自寻学识，不待乎师，而亦足以教人。其手足耳目，已能自用之，理亦已明，文字已通。盖人能得新智之进境，必有教之之法，则在以理使自明，而得知识，非教以事事物物也，此中学也。失其宗旨，而教以记事记物，必至纷无头绪，不得归宿矣。”（林文庆，1914：127）。他揭露英校教育“没有适当的灌输爱国心、孝心、美德和智慧”（Lim, B.K., 1899: 102）。眼见海峡华人社会的腐化，怀抱忧患意识的他对眼前一切有更敏锐地观察，他自觉有更强的使命感去推行改革运动，认为透过教育去提升民族的道德价值观，更是刻不容缓的。

林文庆在《民国必要孔教大纲》的〈自序〉中提到“我国为数千年古国，历代为文明之邦，未几而学者，自谓吾学已无可学矣。清末为外迫之故，不得已而改图，盖为兵力所怵，由不信轻视，转而大歆慕之。至欲大效其强力，谓非西学不可。”（林文庆，1914：1）。对林文庆而言，中国向西方学习并无不可，“然西学无能详确之者。西人之所以强，亦无能详究之者。咸丰之季，一败至清末，皆慕效外法而失其理。”若不根究西方之所以强大的缘由，仅仅一味盲目仿效，将“如觉痒而搔之不得也。”（林文庆，1914：1）。林文庆一针见血的指出“或学日本，或学英、美、德、法、而各视其所学者之美，而不出洋者，又不明其所谓美者，如此则国不几殆哉？”（林文庆，1914：1-2）。

儒家思想不仅是林文庆在倡导新马华人社会改革的理论基础，亦是他中英文著述的思想底蕴和办学育才的重要理念。面对中国激进革新，林文庆明确的表明“革命起义，为吾民困难之故，而推覆专制，望以复我在昔之荣，非欲灭祖宗之德教也。欲合五族以进于文明，自应知我国之美善者，而后能存。否则人各视外国之美，几忘我国我民有特别性情，则宗旨必至涣散。”（林文庆，1914：1）。儒家学说有着许多面向，其中培育君子是林文庆所坚持的信念，而培育德智兼备的君子之目的则是为天下。不管他身处南洋或中国，办教育是他认为责无旁贷的使命。正如他在〈中国的改革〉中所强调的“华人是注重及热爱教育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像华人一样将教育的价值放在如此崇高的地位。”（Lim, B.K., 1898b: 92）。纵观林文庆一生所思所为，他坚信教育得以为国为天下培育君子。

《民国必要孔教大纲》中的〈教学大宗旨〉是篇幅极长的一篇。从中可发现林文庆结合了自身对西方教育发展的理解，主张取人之长，再配上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之优点，因而理出了注重德育的〈教学大宗旨〉。“观夫欧美大国之理学务，多有不同。德之路得马丁，首倡以人人须令读书，而重学堂，而小学须兼有宗教之训。中学须分数种，而后宗旨变更。盖欧洲联合国，有宗教自由，虽然而中央犹必有宗旨，以使要事可以同归一式，其大学甚备，而甚锐进，所重为格致之学。法国之办学亦甚善，其小学不限之以宗教。但教以道德，使合民国资格。其中学则备之以入大学之门。皆政府监之，法国极重师范学堂。故理学堂之官，多毕业者。瑞士国小，而办学甚合民国之体。各省有治小学之权，读书免费。日本办学之法，我国所应知者，盖其与我同类也。其小学之脩金甚宜，且不论男女，皆有读书之令。其取诸外国者，则效法国，以其美善也。英美办学之法，多而杂，有私立，有教会所立。”（林文庆，1914：129-130）。

林文庆先略为介绍了西方各国办教育的历程，再提出中国当时办教育的方针，“以儒道言，我国应先立师范学堂，而求诸英美，聘得良师，而主讲席，此一策也。如急难得师，而立学堂，是乱之也，必至民间之宗旨不定。师范学堂，须集最高学问之人，以详究国粹，而备简明之书。凡各专门之学，须备有为师者考究之书。小学未有教师，可出一二紧要规条，使各学堂有其宗旨。乡里学堂，与其士绅合办，方有热心。小学须有官立私立二者，而同一考试法。准有私立学堂者，所以存人本义也。盖政府所立学堂，必无力求师，以尽合学生资格，为不得视千人而可

以一法为教，以同一书为教，致为师者不得自由更改也。如必万人一法为教，必至人无变通，有如八比时世，一格造士，致空有读书之名，余事茫乎不解。如政府谓私立之学，一概不得设，殊恐中等人之子弟，使其美机，而不能尽其才也。最善者，学堂随各地自为，而合考之，以定优劣。惟考法宗旨，必先行布告，则公私有竞胜之心，进步自速。但私立学堂，必归教育司巡查。而其教师教法，不得减少于公立程度。如此，则私立者两出其费矣，苟公立之尽乎美善，人亦何必私立为哉？”（林文庆，1914：130-131）。办教育应无惧私立学校林立，如此才能促进良性竞争，更全面地提升公立与私立教育机构的素质与水平。

林文庆深知教育必须从幼年开始，再接以小学、中学及大学教育，以完善一个人。但他提出不论从幼稚园、小学、中学至大学皆有其不同的教育方针与着重点。“小学，自六岁至十四岁，分以幼稚园及上下二等小学，更莫善于取法德国，另有继续小学三年，可使必求营生之儿。此三年中，得受各工艺教育，以补缺陷。中学，须得数种，以备将来欲进之事业也。各专门学，如各种工艺法政医学，各省必有一大学，如一时不能举，则二三省共成其一可也。旧日至翰林院，必重攸之，以收各美学之士，拟其程式二。一为大学堂学生以考试而入，一为凡有高才硕学者著书立说者入之，此为名誉翰林。无论汉学西学，皆收之。既收，则必至中国演说十日，将稟刊布。其西文者，则译以汉文。此翰林不同于昔日之为官阶，而为大学进步之机关也。”（林文庆，1914：131-132）。

除此之外，社会创办与推动儒家学会、机构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儒者在各省，必有儒会，以联结同志同学之士，以传夫子之学，而劝励国人。各府州县圣庙，归会中掌理。圣庙之傍，立德学理学师范等学堂，京师国子监，亦归儒学会，为汉文学大机关，以广集天下文学，而联络之。其宗旨为穷经、考古、习礼、治史及政治、树艺、理学、格致，以备采用。此就管见言之，欲尽美善，务及众议成之。”（林文庆，1914：132）。林文庆坚信，孔教必能兴于民间“如此，可望我国慎保其精萃，而不致坠废，以振文明。”（林文庆，1914：132）。

林文庆投身教育，在培养人才时极为注重德育方面的养成。有别于以前的“士大夫”，他眼见越来越多知识的专才图利图安逸。因此，唯有培育具备“君子”德行修养的领袖，以后才会为社稷、为民众谋福利。“以我国徵之，人群之和，如此其大，有如我者乎？何以昔之强盛，而今之衰弱。也夫？古之政治纲纪若何？古之风化，其整饬若何？先圣人教养若何。盖志在斯民，务引之以率循其天道也。自儒学颓败，而立志者少，巧佞之士，见小利者多，以致政府失道，民失其依，灾疫年年，苍生穷困。幸而年丰，又以人多而食不足，以此境象，则空言有立志，亦所不可。盖志而行偏，为害更甚。我国今日处危机之中，切要志士之出而擎持之，更切要志士之有道德也。”（林文庆，1914：67-68）。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 52 岁的林文庆会应陈嘉庚之邀，毅然抛下在新加坡的商界、医界和政界的事业成就，前往厦大担任校长一职。同年 6 月中旬，林文庆

带领家人登上了从新加坡开往厦门的邮轮，6月底抵达厦门。将家庭稍事安顿后，林文庆就于7月4日到校视事，正式开始了长达16年之久的厦门大学校长生涯。

林文庆一再强调，大学专才的培养，不仅是在知识层面，更不能忽略道德修养的培育。“故孟子曰：士尚志，论语博学而笃志。颜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故士者立志，自能率性以发其仁。此为儒者要道。虽人之与物，理一而性不同，而今日格致学，以足明人之层累阅历。远祖盖直接乎禽兽界，此盖示人以更臻上理，非欲人之坠其千万年前之猿猴也，然亦不得遂谓人性皆无异也。人之不同，有如其面。盖由脑之有互异者，其来历有不同耳。此则多少带有祖上缺点焉。时而人有野性，教不能迁，其行为一徇己意，凶猛如兽，所营皆私。此其禽兽性质之复现也。幸而早得善人为之提撕，庶几矫而正之，其道在养其仁心，助其立志。如人而嗜一物，成癖之深，则其前修之美性为之减灭，仅余禽兽性质。故但营其私欲，公理瘳尽矣。如烟酒未深者，得以善法助其立志，使其善性动而再生，自能著力捐弃。”（林文庆，1914：65-66）。

反之，一个人若没有意识到“为恶”的祸害，就“如染毒已久则无可望，与未脩之恶性同。具此善恶二性者，理学道德之家，所难为之筹画者也。孟荀之见性不同，为各从一面观之耳。如见人之带有远代性质，自是性恶；如见人之沾乎教化以后性质，自是性善，推之于理，皆动也。但脑之气结为质，则皆昉自远祖之久。故理之动也，不显其新者之善。如欲其善，则必早教之，则外势之感其脑，自能开其新者，则善种子引出其苗，斯立志矣。从此新径一辟，新理一动，循之以往，皆

亨衢也。故今日者立志而难，明日渐易，日以愈，成矣。”（林文庆，1914：66-67）。

林文庆在厦大校庆三周年的演说表示，“当陈校董在南洋聘予回任校长时，予询以办学宗旨，陈校董答以当注重中国固有之文化，予是以欣然归国，予亦尊重中国固有之文化也。”其实，厦大校主陈嘉庚与林文庆“都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这新生的民国建立在一种稳固的基础上；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人民的教育程度，给民众以知识之光。”（陈共存口授、洪永宏编，2003：43）。

1924年，时任暨南学校校长的赵正平（生卒年不详）在介绍林文庆时所说的一段话，或许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理解为何林文庆当初会做出那样的选择：“华侨中通西洋物质之科学，兼具中国文化的精神者，当首推林博士，博士在南洋，声誉专业，皆历不小，乃竟能抛弃其向来之根据，回国任厦门大学校长，不能不令人钦佩。”（叻报，1924年6月6日：1）。赵正平校长当时亦提到“年来教育之难办，人已尽知”，并进一步介绍“林博士本非教育界中人，有医学之根底，得海外之敬重，竟肯挺身回国，从事于此清苦事业，其牺牲之精神，于此可见。尝考林博士所以来华任厦门大学校长者，第一即为景慕陈嘉庚先生兴学之仁风；第二则因欲实现其素来提倡孔子教育之主张。自欧战告终，西人之研究吾国文化者，日益增多，其中尤以德国为甚，乃国人竟日醉心欧化，不为深究，未免可惜。林博士亦有心人哉。”（叻报，1924年6月6日：1）。

林文庆心目中的大学是“不仅为成人者之所学。理之既深，自非成人不可几之。要在使有德行才能者，而研求深理，以格致之学，使国民进步，不但益于己国，且益及举世，此大学也。”（林文庆，1914：127-128）。在培育专才方面，“若但集召数人，以诵读其中而已，何补哉？必取已成之专门学，以推求新理。而大学毕业，不止谓已学专门，须自研求一门之学，自寻新理而后可。至如为人之道，须有普通资格。博学而知其约，方为大学真意。我国办学，以此为合，此理既定，则经书何待乎办？”（林文庆，1914：128）。林文庆亦引用孟子所说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提出“今日之于经书，为欲求其要理耳。”（林文庆，1914：128）。

在厦大，林文庆积极调整组织，四十多座校舍、学院、宿舍、运动场、体育馆、科学实验室、图书馆和大礼堂等先后在5年内落成。当时的厦大，跟中国其他大学比较，著名学者教授云集，科系齐全，科研出色。（李元瑾，1991：33）。后来，即使“校主”陈嘉庚的事业已滑落，但林文庆仍积极办校，补充师资，增建校舍，增加图书，加强对招生的要求和对学生的管理。（李元瑾，1991：33）。对于图书、设备，林文庆认为十分必要。如果书籍不齐，仪器缺乏，虽然具备良好的教师，但终究不能发挥其才干和作用。所以，对图书及仪器不可有吝嗇之心。

林文庆对教学要求十分严格和对教学质量十分重视。由于当时厦门偏处东南一隅，又不是全国文化与经济的中心，著名教授学者一般不愿就聘。为此，林文庆校长重金礼聘教师，并给予优厚待遇，故吸引了许多教授学者前来任教。当时，礼

聘到林语堂（1895-1976）、周辨明（1891-1984）、鲁迅（1881-1936）、顾颉刚（1893-1980）、杜佐周（1895-1974）、孙伏园（1894-1966）、黄开宗（1892-1929）等一大批在国内外享有声望的教授学者，极大地提高了学校的知名度。

为了更好的体现厦门大学办学的高远目标，林文庆还亲自绘制了大学的校徽，将校训“止于至善”这四个字镌刻在校徽的内圆圈，既显示了它作为大学核心的价值观。校徽外圆圈的上面是中文的“厦门大学”四个字，下面配之以古拉丁语的“AMOIENSIS UNIVERSITY”（厦门大学），显示了中西合璧的办学理念。校徽中内圆圈里的三颗星星，则分别代表了中国传统的城墙及城门为厦门之标记，同时也寓意厦门大学将奉行开放发展的办学理念，提醒在厦门大学就读的莘莘学子，虽然立足于厦门，却应该要放眼全世界（严春宝，2010：113）。

在厦大期间，林文庆演讲时对学生表示大学生活的理想是：“我希望大家在大学里面，应先从怎样‘明明德’方面努力，然后再从‘亲民’的途径上着手，这样循序做去，自可达到‘止于至善’的地步，那么大学生活的理想才算是见诸实现了。”（林文庆，1933：15）。即使是五四新思潮挟排山倒海之势冲击全中国之时，林文庆仍总是勉励厦大的学生要恢复中国固有文化，以统一人民的意志，坚定人民的信仰。他甚至认为“中国旧有宗教、伦理、哲学、美学等文化，能给人民以忠、孝、仁、爱等信念，人民有了这种种信念，才能牺牲自我而为国家。”（林文庆，1934：2）。

林文庆为学校制定了〈厦门大学校旨〉，将办学目的、特点和追求等予以制度化。当中提及“本大学之主要目的，在博集东西各国之学术及其精神，以研究一切现象之底蕴与功用；同时并阐发中国固有学艺之美质，使之融会贯通，成为一种最新最完善之文化。”正如之前所提到的，林文庆为学校确立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校训：“止于至善”，这是根据《大学》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来。1926年10月3日，在中国掀起“反尊孔”、“反传统”的期间，厦大却举行了孔子圣诞大会。林文庆还以“孔子学说是否适用于今日”为题发表演说，一反“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主导中国文化思想界种种西化派的激进反传统主张。他主要强调了三点：一、孔子学说，注重实际，并非徒以怪诞不经之说欺人。孔子哲学，不拘于一时一地的经验，而成“一以贯之”之道，是“千古不可磨灭的学说”。二、孔子道德，根本在“孝”之一字，由家庭渐次社会，再扩展到国家、天下，非徒托空言者可比。欧美各国提倡的博爱，也都是以家庭之爱为源泉。三、孔子时代的尊君，跟当时反对的帝国主义大不相同。儒家的政治主张，可以用“民为贵”一语概括，目的在促进世界进入大同。以上三点，未尝不适用于今日。林文庆的上述观点是他以学者身份对儒家思想进行的当代阐释。林文庆以校长身份兼任厦大国学研究院院长，当然也是为了弘扬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当时反古反孔的鲁迅由北方来到厦大甫一个月，往后的日子里，林文庆成为鲁迅笔下饱受批判的人物。对此，林文庆依然以鲜明的形象，一再强调“大学是设教的最高学府，正所谓入德之门，从此便升堂入室而臻于至善之域”（林文庆，1936：1）。他坚持宣扬儒家思想的伦理观及道德价值观，对于“许多人都是醉心欧美，

主张把我们固有的文化，完全抛弃。”（林文庆，1932：3）的心态，表达出极不认同。

林文庆认为，厦门大学的目标，就是要把道德训练和技术上、职业上或文艺上的修养，融洽起来，来培养为国为民的领袖人物。一个国家若要培育优秀人才，他指出“要么引进外国教师，要么本国的学生就必须走出去，到当今西方最优秀的教育机构去接受教育，在接受了全部艺术与科学的教育训练之后，再回返祖国以使自己的国家受益。”（Lim, B.K., 1898b: 90-92）。

究竟是为什么林文庆要一再突出和强调为国家培植领袖人才的重要性呢？林文庆了解到“若没有领袖来指导一切，则社会不能循序发展，甚至流于腐败崩溃”（林文庆，1933：14）。那么，“民众散漫，毫无国家观念；长此以往，就是外人不来灭中国，在不久将来，中国也自然要受外人同化了。”（林文庆，1936：1）。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让大学生“有了最高的思想和学问以后，还要具有自知、自信和自助的精神，这一点凡是大学生都不可忽略的。还有一层：我们在大学研究学问，培养人格，是为了将来替社会国家服务，而不是为个人达到享乐目的的工具”（林文庆，1933：14）。不能不提的是，林文庆内心向往“君子”所展现的风范。他一生致力于教育，心中理想的大学，就是能够培植“君子”的大学。他认为大学里除了灌输普通知识，指导专门学问的研究外，还要给予道德训练（Lim, B.K., 1936: 49-54）。

林文庆认为“中国的四书五经，维持了数千年的中国社会，在现在虽说有一部分不合时代，然而还有大部分的道理是很真切，可以传之万古而不灭，譬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林文庆，1932：3）。林文庆强调中国社会正需要领袖人才，“有了领袖人才，社会始可进步，民智才能开展。”（林文庆，1932：14）。何谓领袖人才呢？其实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不但有专门的学问，还有深厚的道德修养。“君子”的所为，以“修己”始，以“安人”终。中国需要的领袖人才就是这种能够促进社会，造福人类的“君子”（Lim, B.K., 1936: 49-54）。

“今日而民国之亿兆众，果能保守儒教，以大普及汉文，则外患小小焉耳。吾不虑乎其分也。盖即惨而至于实行其瓜分，终必至再合。故深望我举国上下，取儒道以求治，则进乎新，且不失旧有之美誉，益何如哉，利何如哉。”（林文庆，1914：3）。

1933年前后，陈嘉庚在南洋所经营的橡胶、黄梨等事业大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使厦大财政出现危机，时身为校长的林文庆带头多次捐助，其中于1927年8月至1928年7月捐薪一年，他的第二位夫人殷碧霞（1884-1972）也慷慨解囊，捐款资助厦大。为了筹款，林文庆不仅曾奔走南京、上海、福州、广州等地，也在1926年至1935年间三次亲自到新加坡等处筹募经费（叶钟玲，2001：197）。除此之外，当他初出任校长职位时，便成立了林文庆基金，将新加坡位于兀兰一块五十英亩地的五分之三份额赠给厦大，该基金会每年将所得银行利息汇至厦大。后来，私立的厦大因为“办理完善，成绩斐然”获准立案，在1928年成为合法大

学。经过十年努力，厦大已经设立五学院二十一系，拥有相当完备的教学体制，各方面都仿照欧美而加以改进（李元瑾，1991：33）。林文庆在如此艰难窘迫中承担办学重任，是期望在当时传统文化面临倾塌时，像孔子般即使身处礼崩乐坏的时代，仍继续坚守“道”、坚持其办教育的理念。

林文庆若没有远赴厦门，或许他仍是在新加坡呼风唤雨的社会领袖。然而，眼见中国当时的教育日益摒弃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故他毅然远赴厦门，怀抱着宣扬与捍卫儒家思想的决心，立志为祖国培育君子。

第三节 倡导儒之贤女

1893年，24岁的林文庆学成回返新加坡。及后，他眼见当时的南洋教育对女学教育的全盘忽视，遂与宋旺相、邱菽园等友人联手宣扬女学运动的重要性。这是一项响应中国维新运动，学习西方女学女权运动，同时亦富有地方自发性的活动。在〈儒教伦理的基础〉一文中，他提到为人父母者，应提升子女的知识 and 培育正直的性格，传授他们圣贤的教诲，给予他们关爱和照顾。而在这方面，母亲的角色很重要，她应时刻注意本身的言行穿着，确保是合乎礼。母亲在一个家庭中扮演着教育的角色，林文庆推广女学教育最终目的是希望通过母亲传授做人的道理和正面的价值观给子女（Lim, B.K., 1904b: 206-207）。

同时，林文庆意识到现代化组织和媒介的重要性，他扮演了领导知识分子的角色，创办报纸、杂志、学会、议会等为女学教育作宣传。《海峡华人杂志》于1897年4月出版。1897年-1911年间，海峡华人知识分子在一些重要刊物上发表女学女权思想的文章不下四十篇（李元瑾，1995：277）。林文庆赞同提高女性的教育和社会地位，并将女学的提倡视为教育改革的重要项目。他的文章当中，题目冠上“女学”或“妇女”的至少六篇，其中包括〈华人女子教育〉、〈海峡华人女子教育〉、〈古烈女传轶选〉、〈日本妇女〉、〈中国妇女〉、〈儒家制度下妇女的地位〉。此外，他还有许多探讨教育、婚礼、婚姻、夫妇、儒学的作品也涉及妇女课题。在〈我们的敌人〉一文中，林文庆向大众传达了倡办女学的重要性：“我们的太太将会成为子女们的母亲，她们手中掌握着塑造民族命运的力量。无论如何，我们应善待她们，并给予她们同样接受体育和智育的机会。”（Lim, B.K., 1897: 57）。

在林文庆等人的大力倡导下，新加坡华人女校于1899年4月创立。由五个年轻海峡华人所组成的一个临时委员会拟定了一项建校计划，准备为华人女子，即“未来一代的未来母亲”，提供罗马化的马来文、华文、英文、算术、地理、音乐和缝纫等学科的教育（宋旺相，1993：253）。当时派给大众的筹款传单声称“这个学校的宗旨是要证明依据进步和现代的制度，改良华人教育子女的方法，完全行得通，而且和孔子经典著作所列下的中国人原则相一致；但与现有的方法却完全不同。”（宋旺相，1993：253）。海峡华人将“女子困于室”的观念归咎于自古以

来先辈们的传统做法，认为并无不妥。因此，以林文庆为首，提倡女学运动的海峡华人领袖向群众力证，让女性接受正规教育或开拓视野并非盲从西方教育，更不会违反孔子经典。

女校的发起人急切着要展开工作，先以六千元（其中半数是由邱菽园先生所慷慨捐献。邱菽园是《天南新报》东主，也是已故邱正忠先生的儿子）作为创办基金。四月廿二日，一大批华人团体代表在中国领事馆开会，通过了章程并选举了第一届执委会。中国领事刘毓麟先生，当选为主席；邱菽园和陈合盛诸先生被选为副主席；王顺智先生出任义务秘书；陈武烈先生为义务财政；余柏成、林景贵、宋旺相和林文庆医生则担任执委（宋旺相，1993：253）。

这间学校于六月开学，有七个女生注册入学，两个月以后，据报告有十三个女孩入学（宋旺相，1993：253）。女校成立后，困难重重，包括保守分子的攻击、优秀女孩中途被迫退学和财源短缺。有一些赞助人答应每个月捐献二百元作为经常费，但他们的心是暂时性的，所以这种办学方法在短时期内不得不加以放弃。海峡华人当中老一辈的领导人冷眼看待这所学校，并拒绝给予任何财政上的援助，（宋旺相，1993：253）面对这些困境，林文庆不仅在《海峡华人杂志》把这些情况都作定期的报道和反映，更写了〈海峡华人的女性教育〉（Lim, B.K., 1907: 41）一文，主要谈论女学的重要与任务，并向大众报告新华女校的进展和所需要的援助。

为了减少外界的阻力，以林文庆为首的知识分子提倡教导女性学习使用的东西如刺绣、烹饪、普通家务、体育、科学，让她们享有与同性来往的社交圈子，并教导她们儒家伦理，谨慎剥除令家长忧虑的基督色彩。（宋旺相，1993：91）作为创校人之一的宋旺相是基督教徒，但对于女校排除基督教的影响力全无异议，他深知“新加坡华人女校是我们当中唯一专为华人女孩提供英语初级教育的女校，女孩们的家长非常害怕基督教影响力的提升和净化。”（李元瑾，1995：297）。

林文庆与当时的知识分子怀抱对族群未来的担忧，致力打造符合民情、本土化的女学教育。林文庆在〈海峡华人改革之三——子女的教育〉一文中，以民族的前途为出发点，忠告华人：“女子没受教育，就等于她们所属的那个民族，有一半人数是处于无知和退化的状态，必然不会有很大的进步。”（Lim, B.K., 1899d: 103）。由此可见，逐步发展女学教育是林文庆当时办教育的重要理念。纵使面对困境，“工作既然已经开始”这所女校的发起人决不退缩。后来，富有人家的女孩报名入学者逐渐增加，给发起人带来了巨大的鼓励（宋旺相，1993：253）。在初期，学校的经济时常处于困窘状态。但是，每当学校需要款项以清偿债务的时候，总是有一些耐心且缠绕不休的“募捐员”，为这种义举筹得款项，以应付困难（宋旺相，1993：253）。

1908年这所学校依照（1889年）公司法令（The Company Ordinance）的条款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但属非赢利组织。政府也慷慨地把在禧街（Hill Street）和哥里门街（Coleman Street）交叉处，以前政府化验室（The Government Analyst）所

使用的土地和房屋租借给该学校，租借期九十九年。这个地点适中，由于学校的基金不充足，又缺乏适当的设备，学校的工作乃在极其困难和不利的情况下进行。值得庆幸的是，女校校务的发展持续有所进展，直到最近这几年，海峡华人的家长感觉到有必要给他们的女儿受些教育，所以现在到学校注册入学的女学生大约达到二百五十人。值得注意的是，王顺智先生仍然负起义务秘书的艰巨职务，而林文庆医生（主席）、宋旺相（副主席）和谢佛添及林坤杨（董事）诸先生二十年来为学校的利益而辛勤不懈的工作着（宋旺相著、叶书德译，1993：253-254）。另外有两位人士，他们的名字出现在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筹备工会的备忘录的七个签名人当中。他们是女子教育运动发起时期对女子教育表示同情的少数海峡华人。他们分别是忠实地负起该校义务财政的曾建发（生卒年不详）和最初担任学校委员会委员，后来出任学校董事的杨瑞喜（1860-1909）（宋旺相、叶书德译，1993：255）。

出生于 1895 年，毕业于新加坡华人女校，并作为海峡华人社群中第一位女医生的李珠娘（1895-1947）曾在其文章提到海峡华人妇女教育被忽略的现况“华族的女孩罕有受高深教育的，如读完第三年级和第四年级的程度，就被认为是很足够了。结果她所具有的关于英国人的礼节和习惯只是极模糊的概念。父母把教育女儿看作是浪费金钱，她们被认为无可能在需要的时候来维持家庭的生活，有鉴于此，依照华人的习惯，让女孩为她们的生活而工作那是不适合的和可耻的，因为那必需给她们不断地出去而在公众目光下抛头露面。”（宋旺相著、叶书德译，1993：253-254）。

然而她在结束她的文章时指出，在黑暗中已出现一丝光芒。“在过去三四年里，一个看得出的改变发生了，并且在稳定地增加着。女孩不再那么受禁锢在屋子里了，其中有一些已享有自由的生活，因为父母现在认识到他（她）们的儿女从他（她）们给予的少许自由和教育中所得到的益处了。”（宋旺相，1993：412-413）。而在教育方面，“现在教育已被认为是必要的，甚至较低层的阶级。”（宋旺相，1993：413）。“在父母能力所及，女孩子现在与男孩子同样能得到同等的教育。”（宋旺相，1993：413）。她在文章数度的提及让女性受教育的好处，其中一点深刻地反映出没有受过教育的女性卑微之处，“有许多华裔年轻男孩去一些大学受了教育之后回到新加坡来，常常以他们的妻子不能以有趣的风度谈论一些问题只会谈家务事作为他们经常去参加她们的俱乐部的一个借口，让我们至少要从他们拿走这个借口，那么，事情就会开始好转过来。”最后，她真切的表示“我们希望这种有益的改变将随着年代的推进一直继续下去，使女子智力的发展能得到更大的发挥”（宋旺相，1993：413）。

由此可见，林文庆等人在海峡华人社群所领导的女学运动有其前瞻性及其重要性。自女学创办以后，林文庆一直担任学校董事会的主席，坚持为女校服务二十余年，直到他离开新加坡前往厦门为止。值得一提的是，双亲早逝的林文庆与其兄弟姐妹都是由祖父抚养。在其祖父逝世后，几个姐妹曾分寄在亲友家中。学成归来后在新加坡行医的林文庆，有所积蓄后，才将其姐妹逐个接回，并安置在新加坡华人

女校受教。林文庆对于自己能克尽孝悌之道，感到很欣慰（李元瑾，1991：196）。

除此之外，林文庆夫人——黄端琼的父亲黄乃裳是中国举人。她自小跟父亲学中文，又跟美国教会女教师学英文，曾游览英国与美国。被李鸿章称为奇女子的她，在丈夫创办女校后，负责给年纪较大的女学生教授中国语言（宋旺相，1993：253）。

1916年，来自吉隆坡的诺尔·沃克夫人（Mrs. Noel Walker）为购买战斗机开始向新加坡的妇女们捐募。一开始筹款进展得缓慢，负责动员新加坡华人妇女为该战斗机捐款的华人妇女募捐员包括了林文庆的第二位夫人殷碧霞、宋旺相夫人、李俊源夫人、余连城夫人、李珠娘女士等。后来，由于她们满怀热情的工作，因而募集了大约六千元，该机取名为“马来亚妇女号”，为支持大英帝国及协约国赢得战争胜利而献上的一份珍贵礼品。这是在女学运动期间，妇女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例子，是值得纪念的一件事。

此外，林文庆也以英文写了〈古烈女传轶选〉，他选译自汉朝刘向的《古烈女传》，主要是介绍尧舜、三代和春秋战国时期十三位杰出的女性。行文中提到她们的言行激励丈夫、儿子成为贤君、忠臣和孝子。林文庆希望这些故事能鼓舞正在协助海峡华人妇女脱离无知的社会改革者。

对于女学教育，林文庆一直强调其重要性，他不仅仅在南洋推动，更横跨到了中国厦门大学推行。林文庆上任校长一职后逐步调整现有教职员的工作，同时也宣布将修改大纲、更换课表，并决定于秋季同时在上海和厦门两地广大招生，实行“男女兼收”。在厦门大学建校后的第二年，他实现了男女同学同校，这也体现了他重视女子教育的一贯思想。

林文庆提倡女学运动的特殊性在于，他不否认有受到西方女权运动的启发，但他更强调的是儒家思想是“重妇女”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具体探讨林文庆站在儒家思想的角度，如何看待女性，如何诠释女学的重要性。有关林文庆推动女学的思想，我们可以从他的著作及演辞当中得到清晰的概念，其中不乏他回应西方教士的文章。

林文庆之所以与基督教掀开笔战，主要是因为传教士或西方学者扭曲了儒家思想内容，并恣意下定论或引例，误导大众，以褒扬基督教而贬低孔教。除了讥讽孔子不事上帝、不知真理及抨击孔教专制迂腐的教条之外，他们认定孔教轻视女性，并以此作为主要攻击点。“请得言乎儒道之待女界者。今日外国之学问大进，我留学生多至其国，闻其言论，似以儒者之轻视妇女矣。且其传教士，常著书演说登报，谓儒者之轻妇女，华人遂亦自以为然。而教士者竟云，尔国之弱，为其轻视妇女之故。又云，中国人无有良心，已溺女为据。又谓华人闭妇女于室，使无学问，仅作玩物。又讥华人之有妻妾，如此等等。”（林文庆，1914：134-135）。

对此，林文庆并不否认中国确实这类情况的发生，“其言不尽无凭。”（林文庆，1914：135）。但是，他直指西方历史的演进过程，亦有这类情况的发生，没有例外。“究之中国今日之俗，异乎外国者，皆无识之人。则从前之溺女一事，亦有之。然考外国之事，其轻视妇女，更有甚者。杀妻戕子有之。盖此等恶俗之类，我国彼国无异。”（林文庆，1914：135）。

对于大众普遍上认同儒家学说是蔑视妇女地位，另一边厢西方传教士、学者一再以西方是重视女性、女学、女权一方自居，高人一等的论调，使大众对儒家学说更为抗拒及厌恶，林文庆提出了清晰的见解：“至言儒者之轻视妇女，极是无凭。夫儒教之视男女，本属一类。所谓敌体，如阴阳之相辅，而不能相失，故视之并重。然欲阴阳之顺理，以至明德，法则不同，盖性有不同者也。欲知儒者之待妇女，必先明男女之性，及天之生女何用处，其功何在。盖儒者究其理致性质，以男女不同，故必于礼乐学术分别其教。”（林文庆，1914：135）。因为，唯有这样，方能“使妇女步步行之，得以顺理也，此之谓阴教。”（林文庆，1914：135）。

由于“男女之性有别”，林文庆提出“儒者之妇女，要有学问，有知识，有治家资格，清操谦让，达孝克慈，训子义方，尽心以助其夫。”（林文庆，1914：139）。而丧失了配偶的妇女，则应做到“夫死佐子理家，不使废坠为分。故儒者之于母，不异乎父。故妇女必无与男子争强者。”（林文庆，1914：139）。眼见西方社会的女权抬头，林文庆认为过为激进的倡议男女平等或过度强

调女性主义也有其弊端。“欧美今日之妇女，必欲习男子事。同在学堂，而劳心力以究其高深，而与男子争权，自是妇女精神，当不亚男子。但必有二弊，一不善生育，二以劳力之故，而容颜粗若男子。是故欧洲生子之数，年减一年，法国为甚。至于听年少者之自由，而野合生子者，英国每千二人，德国柏林，每千四人，奥国更多。英国伦敦一城，流为娼者，至八万人，欧洲遍地妓女，或明或隐耳。”

（林文庆，1914：138-139）。林文庆反驳西方自命清高的言论，甚至提出数据以论证西方社会“其所重视妇女者，腐败则甚于我。取其历史而比较之，其妇女之轻实甚。”（林文庆，1914：139）。

针对儒家扼杀婚姻自由之说，林文庆提到“阴阳之气质性情，在生物中无一相同，如仁道在禽兽中，亦必有其理。惟不得究取禽兽举动之性，而施人之，则男女亦不得取野人世代之境，而谓文明时世亦必若此。如非洲土人，全不衣服，惯习于赤体，而视为常。迨乎久习文明而成风俗教化，自是离其习惯，而生羞耻。我国女人，衣裙必以蔽体，为我教化，在不欲人之见妇女美丽也。此我圣人之教，在以德行为重。欧洲之人，承希腊慕美之俗，以身体之天然为美。故其盛礼，则妇女露其半身，以呈美丽耳。妇女之情，自是好为妆饰。男子之情，自是易为美色感动，禽兽野人，则由此合也。”（林文庆，1914：136）。由此表明，中西文明之异处，进而阐述儒家的立场“儒者不欲人之下等者自待，而以理化其山野之性。故男女之合，必以媒妁，视人道之合宜而配之，不使不阅历少年，草率其毕生。为父母者，两家商订，而有媒妁，一一比较，而后订婚。盖我儒宗旨，立家为一生大

事，必经审慎，此人道之正也。我国人必勿为外俗所误，夫外国妇女，为多数男子所搅乱，其情必不能定，而色心以活，势必择其愉色之能感情者，德不暇择也。外国人谓之爱，则亦何尝爱也？仅其外貌之浅者暂者耳，至为夫妇日久则生厌。一遇其新者，遂生枝节。”（林文庆，1914：136-137）。

林文庆认为儒家思想并非蔑视女性，“我圣人实重妇女，务致其为人之理，而离乎禽兽界，不乱动其至贵之心也，范围之不使为强暴者辱，待其可亲者，而后亲之，盖视妇女之极贵也。西人之结婚，多不能致安乐。我国之结婚，多得宜家，岂无其较哉？我国妇女，居室之权则重，所谓女正位乎内也。儒者之视子女如一，父母如一。”（林文庆，1914：137-138）。林文庆力证儒家学说有保护女子“至贵之心”的初衷。

总而言之，林文庆大力鼓励女子应上学接受知识，只是“至于女子之读书，儒者惟不使男女同学耳，则有姆教。”（林文庆，1914：138）。站在儒家思想的角度，男女应分开接受教育，是因为“盖男子学堂，必渐提其男子之性。女子学堂，比纯养其女子之性，各不同也。此而后男女合，而各备其为一家之用。”（林文庆，1914：138）。他亦强调，女性在一个家庭的重要地位“盖所谓家，则必有男女，各得其用而后顺，则国亦以之安也。生子养子，为最要事。脑力务存其可为此用者。”（林文庆，1914：138）。另外，配合医学上的知识，林文庆提出“儒学而处今日，亦必欲妇女得卫生之法，以壮其身体，惟不在致其武勇也。”（林文庆，1914：138）。

由此可见，林文庆不仅在海峡华人社群及中国厦门大学的女学运动方面扮演拓荒者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林文庆在诠释儒家思想对女性地位的看法时具有提出“儒之贤女”的贡献。

第五章 结语

林文庆曾在《民国必要孔教大纲》提到“盖自游学西国初归之时，见华侨之在南洋景况，而惧其子孙之不识本国语言文字，自失其无数子孙矣。”（林文庆，1914：40）。他在英国时期已开始思考海峡华人的文化认同及身份认同的问题，回到南洋时的所见所闻给他带来的震撼在于中国移民在没有英政府扶植下努力兴学，致力灌输儒家道德观念于孩子的景况。“故虽自知吾学不才，辄以孔子之道告人，勉人以学普通语，于学堂传孔子之道德学。幸自爪亚李君兴廉陈君金山不以为谬，倡设中华会馆，以教汉文，传圣道以至今日。凡南洋各地，有华人之居，则有孔子学堂，可喜也。夫孔教一兴，而人心无不爱国而念祖泽矣。故华侨之热心，则本诸开通而保存国粹也。”（林文庆，1914：40）。

林文庆醉心于儒家学说，并致力于行。他在南洋与中国厦门大学之所以大力推行孔教运动，是建立在他对儒家传统文化的信心及把握，因而无惧他人的目光。面对西方主义与西教在中国的兴盛，而中国传统文化却遭受摒弃，“所望于今日我国学界之士，皆得如南洋侨人，为孔子木铎，而民国人人有君子资格，且不仅振兴我国而遂己也，则必推此仁心，传吾文明教化，以及地球万国。”（林文庆，1914：40）。

林文庆在那一个时代推行“孔教”、提倡“女学”及培育“君子”教育的三方面，确实有其建树及前瞻性。他一针见血的指出“夫今日我国人常谓外人侮我，以兵力吓我矣。抑知其所以欺我者，为我弃圣人之道，而无教无宗旨乎。”（林文庆，1941：40-41）。因此，他劝勉人们必须“苟立吾志，行吾仁义，取法先儒，克己齐家治国，杀身成仁，则又何患外侮之不消，内治之不振哉？”（林文庆，1941：41）。

林文庆在《民国必要孔教大纲》中曾如此提到：“夫子之道，不误民国。故虽学识浅陋，不足以醒斯世，而不敢不言也。望我同志儒者，出而尽其所学，共订其何以阐明理说，开吾民智，使人人肯行大义，以振兴我至可爱祖国。”（林文庆，1941：143）。林文庆认定中国的古代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要是能适当的加以运用，就可以成为制造民族领袖的最佳手段，最主要的是施行道德训练，使这些领袖成为孔子所说的“君子”。诚如他所说的“舍儒教何以能聚众心之如是。故以儒道，而偏我四万万众之心，使我历代之雄豪复起，此君子自强不息之理也。”（林文庆，1941：134）。

有别于一般中国学者，由于林文庆本身的经历与人生历练，他对西方历史文化的评价并非本于中国文化优越论和中心论的立场。相对的，他对于现代中国如何充分吸收西方文化来复兴民族文化有一套深入和具体的建设性主张。林文庆除了自身潜心苦研儒家学说之外，还立志著述及以教育来弘扬传统文化。

林文庆之所以不受地域、种族和文化的局限，是出自于他对儒家思想的信念。例如，他认为“安百姓”、“为社稷为天下”正是儒者应为之事。“义者，事之宜也。如人有应为之事，应有之分。必力尽此心，所谓义也。欲知义，先须审别是非。”（林文庆，1941：85）。国家领袖应尽心尽力地扮演好自身的角色，这样社会国家方能安稳和谐。“所谓义理也，人群既立，圣人因人心而为社律。社律者，取人心能和之理以为准。逆此理，则为逆众人之和而坏大局。故有不能和者，必不容于众，而不能为害也。古圣人之立义，原由合群之公益，且含有儆戒意。”（林文庆，1941：85）。因此，不论林文庆身在何处，他坚守“为社稷为天下”的信念。

林文庆认为儒学最核心和根本的精神是“教育”，而立志习儒与致力培育“君子”更可谓是林文庆的志愿与理想。我们可以由此解读林文庆身处不同地域，面对不同社群时所给予的关怀行为正透露着他对儒家思想的推崇。林文庆的儒家思想并没有停顿在道德修养的层面而已，他进一步勉励学生与世人完成个人修养，是为了社会做出贡献。对他而言，一位有仁德的社会领导人将由狭义的家族、家乡观念，扩展到国家、民族观念，进而有了“为天下人”的抱负。

厦门大学校长陈嘉庚曾在一场宴会上描述医生可分为三类：“医生之主义在乎救人，然均属医生而救人之道鄙意按分别三项：一自救，二自救并救小部分之人，三置自救于不顾而注意以大规模救人为职志。”毫无疑问的，在陈嘉庚眼里，林文

庆正是属于第三类的医生。他不仅仅将目光停留在医学领域，更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以便能更大规模的为社会服务，救治与协助社会上更多的人。

林文庆的足迹烙印在南洋、中国与欧洲，并在医界、商界与政界上，尽了个人最大的力量。此外，他也成立学会、俱乐部，甚至领导改革组织，出版杂志和报纸，举办座谈会及讨论会，向大众发表的演讲课题涵盖了各种的时事课题。纵使林文庆的专业在于医学，但他不局限自己在医学界，而是进一步突破自身的局限，将触角伸展到其他领域，向社会大众展现其多面性的才能。

在华人社会以“仕”、“商”、“士”、“工”分层的阶序里，林文庆在当时因为海峡华人的身份及其具备的语文条件及专业知识，而身兼“仕”、“商”、“士”，是当时学而优则仕则商的典范。然而，无论林文庆在社会上扮演哪一个角色，他最终迈向“教育”这条道路上，并始终以学习、实践与宣扬孔教为己任。纵观他的著作、生活型态与人生历练，儒学确实成为他极为注重的生命涵养，并与之时时鞭策自己学习及展现“君子”的风范。

林文庆以孔子为榜样，他说“我夫子盖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志既立，斯足以行仁道。行仁道，则亦率性而已，则前所谓立人界而已。盖人脑之理，偏乎四周，此之谓参天地也。此非另自一理，亦循乎天理而已。否则自为固执之心，使人类坠于危机也。”（林文庆，1914：65-68）。他坚信儒家思想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安身立命之道。正是因为林文庆一生所作所为不仅仅局限在其峇峇、南洋子

民、华人的身份，他同时也投身于社会、文教、政治和商业各界中，这使到他的贡献与影响，跨越社群，跨越地域，自觉地怀抱了儒家“为天下”的胸襟。最后，笔者不得不强调，林文庆并不局限于南洋、中国或英国的地域藩篱、政治取向，也不牵涉入其中的文化冲突上，这是因为他怀抱的是儒家思想中所强调的君子为天下的理念。儒家思想是林文庆终其一生的依归，惟有了解他的儒家思想，方能更全面及深层的认识与展现林文庆的内涵。

征引书目

甲、中文部分

(1) 专书

[宋]朱熹撰（1983）。《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

[清]李钟珏著、许云樵校注、陈育菘主编（1947）。《新嘉坡风土记》。新加坡：新加坡南洋书局。

巴素（1967）。《东南亚之华侨》（上册）。台北：国立编译馆。

蔡佩蓉（2002）。《清季驻新加坡领事之探讨（1877-1911）》。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

陈共存口授、洪永宏编撰（2003）。《陈嘉庚新传》。新加坡：陈嘉庚国际学会、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

陈蒙鹤著、胡兴荣译（2008）。《早期新加坡华文报章与华人社会（1881-1912）》。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

崔贵强（1994）。《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

柯木林、林孝胜（1986）。《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学会。

李光耀（1998）。《李光耀回忆录：风雨独立路 1923-1965》。北京：外文出版社。

李元瑾（1991）。《林文庆的思想：中西文化的汇流与矛盾》。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

李元瑾（2001）。《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

- 李泽厚（2003）。《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梁志明（1999）。《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林文庆（1914）。《民国必要孔教大纲》。上海：中华书局。
- 刘彦著、李芳晨增订（1962）。《中国外交史》。台北：三民书局。
- 宋旺相著、叶书德译（1993）。《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 王秀南（1970）。《星马教育泛论》。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
-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编委会（2007）。《林文庆：生平回顾（1869-1957）纪念书》。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图书馆。
- 严春宝（2010）。《大学校长林文庆——一生真伪有谁知》。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
- 周聿峨（1996）。《东南亚华文教育》。暨南大学出版社。
- 庄钦永：《新甲华人史新考》，南洋学会，1990年，页162-163。

（2） 论文及文章

- 陈志明（1984）。〈第七章：海峡殖民地的华人——峇峇华人的社会与文化〉。载林水椽，骆静山。《马来西亚华人史》。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 陈徽治（2003）。〈马来西亚儒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见于陈荣照主编《儒学与世界文明》上册。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 陈荣照（2003）。〈儒学在新加坡的传承和发展〉。见于陈荣照主编《儒学与世界文明》上册。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 超（1957年1月19日）。〈我所认识的林文庆博士〉。载《星期六周刊》，南洋报社有限公司，第385期。
- 李元瑾（1995a）〈生前奋斗，死后遗爱，为林文庆向历史讨公道〉，见于《联合早报》，分三期续完：1995年7月9日，1995年7月23日及1995年7月30日。

- (1995b) 〈新加坡海峡华人知识分子的女权与女学思想〉, 杨松年与王慷鼎合编《东南亚华人文学与文化》, 新加坡: 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 1995年, 页 263-297。
- (1999)。〈历史重演? 新加坡两场跨世纪的华语运动〉。见于《亚洲文化》。第 23 期。
- (2001)。〈新马儒教运动 (1894-1911) 的现代意义: 以 1980 年代新加坡儒学运动之验证〉。李元瑾主编。《南大学人》。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 (2003) 。〈林文庆: 中华文化复兴者与现代教育家〉。见于何国忠编。《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文化篇——承袭与抉择》。马来西亚: 华社研究中心。
- 廖建裕 (2008)。〈马来西亚的土生华人: 回顾与前瞻〉。载于《东南亚与华人族群研究》。新加坡: 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
- 林文庆 (1924 年 6 月 6 日)。〈林文庆博士在暨南学校演讲会记 (暨南通信)〉。
- (1928 年 1 月 5 日)。〈林校长之大学责任观〉。《厦大周刊》, 第 192 期。
- (1929 年 6 月 8 日)。〈林校长撰赠奉安挽辞〉。《厦大周刊》, 第 207 期。
- (1932 年 9 月 26 日)。〈大学生应有之态度〉。《厦大周刊》, 第 12 卷, 第 1 期。
- (1933 年 9 月 30 日)。〈大学生活的理想〉。《厦大周刊》, 第 13 卷, 第 1 期。
- (1934 年 3 月 17 日)。〈中国如何救亡图存〉。《厦大周刊》, 第 13 卷, 第 15 期。
- 林远辉 (1983)。〈清代在世界各地设置领事问题初探〉。《华侨史论 (第三集)》。广州: 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
- 苏新鏊 (2010)。〈儒家思想近十五年来在新加坡的流传〉。林纬毅主编。《别起为宗: 东南亚的儒学与孔教》。新加坡: 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
- 徐李颖 (2010)。〈从花果飘零到香火鼎盛——新加坡儒教在民间发展的三种模式〉。林纬毅主编。《别起为宗: 东南亚的儒学与孔教》。新加坡: 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

颜清湟（2001）。〈序〉。李元瑾著。《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

-----（2007）。〈孙中山与新马华人〉。陈剑主编。《从历史角度看海外华人社会变革》。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

-----（2007）。〈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侨的民族主义（1877-1912）〉。陈剑主编。《从历史角度看海外华人社会变革》。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

-----（2009）。〈林文庆与东南亚早期的孔教复兴运动〉。见于李元瑾编。《林文庆的厦大情缘——东西穿梭 南北往返》。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2010）。〈1899-1911 年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孔教复兴运动〉。见于林维毅主编。《别起为宗：东南亚的儒学与孔教》。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

-----（2012）。〈从移民到公民：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的演变〉。见于《2012 年第一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双年会会议手册》。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叶钟玲（2001）。〈新马华人对厦门大学的经济支援（1926-1937）〉。见于李元瑾编《南大学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3） 报章

《天南新报》1901 年 10 月 8 日。

乙、 英文部分

（1） 英文期刊

Lim Boon Keng (1895 Oct.).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in China". *Transactions of the Straits Philosophical Society (T.S.P.S.)* Singapore: Vol. 3.

_____ (1897 June). "Our Enemies".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S.C.M.)* Singapore: Vol.1, No.2.

_____ (1898a June). "The Attitude Of The State Towards The Opium Habit". *(S.C.M.)* Singapore: Vol.2, No.6.

_____ (1898b June). "The Renovation of China". *(S.C.M.)* Singapore: Vol.2, No.6.

_____ (1898c June). "We are a Peculiar People". *(S.C.M.)* Singapore: Vol.2, No.6.

_____ (1899a Sept.). "Digestion". *(S.C.M.)* Singapore: Vol.3, No.11.

_____ (1899b March). "Straits Chinese Reform 1- The Queue Question". *(S.C.M.)* Singapore: Vol.3, No.9.

_____ (1899c June). "Straits Chinese Reform 2- Dress and Costume". *(S.C.M.)* Singapore: Vol.3, No.10.

_____ (1899d Sept.). "Straits Chinese Reform 3- The Education for Children". *(S.C.M.)* Singapore: Vol.3, No.11.

_____ (1900a Sept.). "Straits Chinese Hedonism". *(S.C.M.)* Singapore: Vol.4, No.15.

_____ (1900b Mar.). "Straits Chinese Reform 5- Filial Piety". *(S.C.M.)* Singapore: Vol.4, No.13.

_____ (1901a June).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S.C.M.)* Singapore: Vol.5, No.18.

_____ (1901b Dec.). "Consumption, or The Great Scourge Of Civilization". *(S.C.M.)* Singapore: Vol.5, No.20.

_____ (1903 Sept.). "The Role Of The Baba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S.C.M.)* Singapore: Vol.7, No.3.

_____ (1904a Mar.). "Ethical Education For This Straits Chinese". *(S.C.M.)* Singapore: Vol.8, No.1.

_____ (1904b Dec.). "The Basic of Confucian Ethics". *(S.C.M.)* Singapore: Vol.8, No.4.

_____ (1906 Dec.). "The Opium Question". *(S.C.M.)* Singapore: Vol.10, No.4.

_____ (1907 June). "Female Education for Straits Chinese". *(S.C.M.)*, Singapore: Vol.11, No.2.

_____ (1909 June). "Confucianism in the Far East". (*T.S.P.S.*) Singapore: Vol. 17.

_____ (1915 Jan.). "The Confucian Conception of the State". *Proceedings of the Straits Philosophical Society*. Singapore.

(2) 英文专书/论文

Vaughan, J. D.(1879).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Singapore: Mission Press.

Edwin Lee (1991). *The British as Rulers Governing Multiracial Singapore 1867-1914*,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Khor Eng Hee (1958). *The Public Life of Dr.Lim Boon Keng*. B.A. Honours. Thesis, University of Malaya.

Lim Boon Keng (1931). *The Quint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Amoy University.

Song Ong Siang (1909). "The 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Straits Chinese Annual*.